

第 45 期（总 45 期）
教学管理办公室编制

目 录

■ 新闻动态

- 继续教育学院在第 15 届中国国际远程教育大会上荣获多个奖项 .. 4
- 北京大学国际咨询委员会 2016 年会议召开..... 5
- “新青年·享阅读”之“学·习”板块上线吴飞首讲领读《政府论》..... 7
- 北京论坛（2016）在北京大学圆满落幕..... 9
- 第三届大学社会责任高峰论坛举行..... 11
- 【“大学堂”讲学计划】著名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教授访问北京大学 . 15
- 林建华校长实地察看北大创新创业中心和二教协作学习空间 20
- 北京大学再次获得全国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绩效考评第一名 22
- 2016 年北大-斯坦福论坛开幕 23
- 北京大学与伦敦大学学院签署“中文培优项目”合作备忘录 26

■ 网教之声

- 在线教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慕课..... 28
- 在线教育的春天 30

■ 北大人物

- 张益唐：数学给我带来幸福 34
- 何国琦：一路坎坷，不忘胸中山河..... 40

■ 学者谈读书

王蒙：创造性的读书 48

黄永玉：书和回忆 49

■ 好文共赏

陈平原：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 52

■ 史苑钩沉

史焕章：情系未名湖 57

■ 大美北大

小雪 62

■ 学员心声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习收获与感想..... 63

编辑寄语

2016年12月1日至2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远程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以“终身学习：价值链与生态圈”为主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研讨。《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中国国际远程教育大会组委会评选了“中国现代远程教育（1998—2016）·终身教育特别贡献奖”，我院经过评选获得此项殊荣。我院广东学习中心、深圳学习中心分别获得“2016年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优秀校外学习中心”。教学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张琼、网络学习中心副主任张丽两位老师在全国被推荐的近百名教师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高校百位继教名师建设工程”的首批名师，被授予“全国高校继教名师”称号。

衷心祝贺我院取得的优异成绩，期冀我院在现代远程教育领域继续脚踏实地，稳步前行，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涌现出更多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在推动终身学习和构建学习型社会中发挥出更好的示范引领作用。本期期刊就在这一喜报中开篇。

主办：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承办：教学管理办公室

编委会组成：

主编：章政

副主编：杨虎、常靖

执行副主编：王凝、杨雯宇、吴晓风

编委会成员：肖志欣、曾玉芬、郑鹏、杨舒婷、刘晴晴、石传芬、唐海峰、孙叶敏、王帅、王迎春、王姗姗、林以晴、高前余、张翼、吴丹、王凯惠、徐燕、张凯、赵晓玲、白永花、司敏、李文文

新闻动态

继续教育学院在第15届中国国际远程教育大会上荣获多个奖项

2016年12月1日至2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远程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汇集了政界、业届以及学界千余名嘉宾，以“终身学习：价值链与生态圈”为主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研讨。大会还隆重表彰了近年来在远程教育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院校、教育机构和先进个人。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荣获多个奖项。

为嘉奖在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做出突出贡献与显著业绩的高等院校和教育机构，《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中国国际远程教育大会组委会评选了“中国现代远程教育（1998—2016）·终身教育特别贡献奖”。我院经过评选获得此项殊荣。



为进一步推动校外学习中心不断提升建设、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持续提供更高水平、学生满意的学习支持服务，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做出贡献，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联合《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开展“2016年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优秀校外学习中心”评选活动。经过评选，我院现代远程教育广东学习中心、深圳学习中心分别获得“2016年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优秀校外学习中心”。会上，学习中心代表老师杜根大、王玮分别代表所在学习中心领奖。

为积极推进面向继续教育从业者开展关于继续教育政策、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培训，进一步提高继续教育从业人员整体水平和业务能力，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和《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联合开展“全国高校百位继教名师建设工程”活动。我院教学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张琼、网络学习中心副主任张丽两位老师在全国被推荐的近百名教师中脱颖而出，成为该工程的首批名师，被

授予“全国高校继教名师”称号。会上对评选出来的来自全国高校的 20 位老师颁发了“继教名师”证书。

衷心祝贺我院取得的优异成绩，期冀我院在现代远程教育领域继续脚踏实地，稳步前行，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涌

现出更多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在推动终身学习和构建学习型社会中发挥出更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来源：继续教育学院

编辑：丁香的花朵

北京大学国际咨询委员会 2016 年会议召开

2016 年 11 月 4 日，北京大学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举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和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共同向与会的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颁发了聘书，感谢他们为北大的发展出谋划策。

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杰弗里·雷蒙，香港大学前校长徐立之，新加坡前外交部长、印度那烂陀大学名誉校长杨荣文，剑桥大学教授兼剑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彼得·诺兰，信和集团主席黄志祥以及克林顿集团副主席哈尼·冯德克利等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听取了林建华对学校情况、近期发展等方面的介绍，并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会议现场

林建华简要回顾了北京大学的人文传统与发展历史，详细阐述了学校的学术体系改革、学科建设情况以及人事管理构架，着重分享了北京大学未来的发展设想和重点领域，并提出了北大如何基于中华文明和东方文化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如何开创具有北大特色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以及建设北大深圳校区等问题。

杰弗里·雷蒙认为，北大将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智力储备，因此应在跨文化研究领域进行专业严谨的

学术研讨，以批判创新的思维研究不同文化的认知模式和价值观。

徐立之通过对比世界各国的教育模式，指出中国的变化很快，兼容并包的学习能力非常强，能够在发展中不断融合孕育新的文化理念。因此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北大既应开展内部研讨论证，同时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综合内外部视野寻求发展方向。

杨荣文强调，中华民族拥有悠久深厚的历史，以唐朝为例，当时人文学术气息浓郁，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中国当代高等教育要走向世界，更应该汲取历史底蕴和智慧，并结合北大优势加强区域研究，从而更好地面向未来。

哈尼·冯德克利认为，大学管理可以参考企业管理，必须制定优先战略，优化资源配置，区分治理与管理，促进跨文化交流与跨学科发展，从而提高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

彼得·诺兰指出，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不断提升，要建设更具全球视野的高等教育体系，尤其在“一带一路”发展框架下，大学需要更好地掌握国际话语体系，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文化。此外，大学应平衡教育与

科研，促进二者有机融合，并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框架和绩效管理制度。

黄志祥非常赞赏北大深圳校区的发展计划，认为这将为北大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他就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提出建议，指出将中西方教育方式优势互补，促进传统习得与创新的教学方法相融合，将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发掘学生的潜能。

会后，朱善璐在北大临湖轩东厅会见了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一行。朱善璐介绍了北大的历史沿革和文化遗产，强调北大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中，要不忘初心，遵循教育本身的规律；要有文化之根，传播中华文明及其历史与传统；更要兼容并蓄，积极借鉴世界各国高等学府的教育理念和模式。2018年北大将迎来120周年校庆，希望各位委员积极贡献智慧，探讨契合北大未来发展方向的相关议题，提供广阔的国际视野。

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们感谢北大给予的信任和荣誉，表示很荣幸参与北大未来的发展，并将在高等教育合作与发展领域为北大积极贡献知识和经验。

北京大学国际咨询委员会于2014年底开始筹建，旨在加强北大与国际社

会的交流与合作，借鉴全球优秀大学办学治校的经验，加快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进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由世界著名大学校长、跨国公司负责人及全球知名政要组成，为北大提供战略性咨询，

帮助北大与全球建立和发展战略性交流与合作关系，支持北大改革与发展。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江南

“新青年·享阅读”之“学·习”板块上线吴飞首讲领读《政府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并推荐了不少古今中外经典著作，主旨正与“新青年·享阅读”读书沙龙的初衷相契合。基于这份“习大大书单”，“新青年·享阅读”读书沙龙活动在成功举行 13 期的基础上，特别开设“学·习”板块，倡导同学们走近经典、深入阅读。

2016 年 11 月 14 日上午，作为“新青年·享阅读”读书沙龙“学·习”板块首讲，网教办特别邀请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担任“领读导师”，带领同学们阅读约翰·洛克的著作《政府论》。

《政府论》是英国约翰·洛克于 1690 年出版的政治著作，汇集了洛克的主要政治哲学思想，不仅使洛克成为古典自由

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且对于后世的现实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读书沙龙分为导师领读和提问探讨两个环节。

到场的同学来自学校各个院系不同年级，在大家轮流讲述对洛克《政府论》的了解和所关注的问题后，吴飞老师开始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他首先为同学们解读了洛克本人的经历以及写作《政府论》前后的重要历史事件，帮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政府论》与英国光荣革命甚至美国独立宣言的联系。随后，吴飞老师结合洛克的其他重要著作以及《政府论》英文原典，带领大家对照书目的文本进行细读，探讨洛克神法、人法、教会法（兄弟法）、私人法的层级逻辑关系以及其中最核心的自然法问题。在吴飞老师看来，《政府论》上篇针对菲尔麦支持君主制和父权的批评，一定程度

上也是对霍布斯主义的批评，下篇 2-8 章所描述的人们所能获得的平等和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只有在自然法的状态下才能获得，而每个人凭借自己的“理性之光”皆可认识。最后，吴飞老师还介绍了洛克的“白板说”思想以及他的《人类理解论》《论宗教宽容》等著作。



吴飞老师对同学们的问题一一解答

在自由提问环节中，有同学就老师提到的“每个人都能凭自己的理性之光认识自然法，但又有人会去违反自然法”二者之间的矛盾表示困惑，吴飞老师提出，这就是洛克与霍布斯思想所不同的地方，关于这个矛盾，可继续阅读洛克《人类理解论》来加深理解。

其后大家还提到了许多自己关心的问题，吴飞老师一一予以回复，同时还不时跟同学们分享一些自己延伸出来的

想法。提问与讨论过程中，师生的积极互动使得交流读书心得、启迪问题思考的活动立意不断凸显。最后大家合影留念，本次读书沙龙活动圆满结束。

作为“新青年网络文化工作室”的重点线下活动，“新青年·享阅读”读书沙龙定位于小型高端学术讨论，致力于为同学们搭建“深入阅读”与“即时交流”相融合的读书平台，在传承与变革的大时代背景下，努力在校园中营造自主阅读、自主思考、自主探讨的良好读书氛围。本年度起，学校网教办不仅推出“学·习”系列活动板块，还联合北京云舒写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设立了云舒写“好读书”奖学金。云舒写“好读书”奖学金将同“新青年·享阅读”读书沙龙一道，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协同推进北京大学“书香校园”建设事业。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北京论坛（2016）在北京大学圆满落幕

2016年11月6日，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互信、合作、共享”为主题的第13届北京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落下帷幕。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黄侃，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以及参加本届北京论坛的数百位学者出席了闭幕式。闭幕式由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主持。

首先，林毅夫教授以“一带一路与自贸区——中国新的对外开放倡议与举措”为题发表演讲。他指出，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与与时俱进的双轨制起到了重要作用，维持了中国经济的稳定高速发展。林毅夫同时提出，双轨制发展也引发了贫富差距、腐败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如今的改革应该从双轨制入手，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他表示，自贸区的改革意味着在涉及国家安全与民生安危的关键领域之外，开放原来禁止外资涉入的领域，允许外资进行投资，进一步推动资本开放，促进资

本的自由流动。改革开放离不开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连接，离不开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的共享。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应运而生。“一带一路”建设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抓起，获得了国际各方的积极参与和好评，不仅改善了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情况，也为我国产业转移、经济转型提供了发展契机，推动了沿线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在演讲尾声，林毅夫总结道，自贸区改革与“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与时俱进的对外开放举措，将推动我国向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实现世界各国的互利互惠，使我们一同步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时代。

朴仁国先生首先对本届北京论坛的成功举行表示祝贺，对为北京论坛作出重要贡献的组织者和志愿者表示感谢。他表示，在过去的三天时间中，各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互信、合作、共享”为主题，开展了多样对话，讨论了气候变化、经济格局的改变、教育的发展等问题。国际社会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要想解决国际问题，就必须有更多的合作。我们应该顺应变化，发挥自身创造性，努力找到创新的平台。

他指出，明年中国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韩国也将进行总统大选，东亚地区即将迎来新的领导换届。为了实现东亚地区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北京论坛的民间交流角色就显得尤其重要，他希望今后中国继续起到引领作用，为世界的发展与和平贡献新的力量。最后，朴仁国以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结束自己的致辞。

黄侃在致辞中表示，作为举办单位之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一直关注北京论坛的发展，并且见证了13年以来北京论坛的层次提升、影响力提高，以及其对高等教育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北京市教委将向更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合作和教育前沿前进。北京论坛举行了不同类型、规模的交流活动，在青年学生论坛、文化传承、教育保护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之前巴基斯坦分论坛的举行为北京论坛走向海外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他提出，北京市教委将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北京大学携手，将北京论坛办得越来越好。

朱善璐在致辞中对与会嘉宾和来自世界各国300余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感谢。他说，今年的北京论坛是

13年历史上重要的一次，它秉承了论坛的主旨，并且突出了时代主题——互信、合作、共享，这和杭州G20峰会的主题一致，同时以学术为特色。他表示，北京论坛虽然是一个学术性论坛，但也是开放性论坛，欢迎关注人类发展和未来走向的企业家以及其他领域人士参与。他指出，当今世界价值观多样，大学、学者、青年人应该对价值观的重建作出自己的努力，展望20周年，希望北京论坛能够用思想照亮人类未来发展的道路。此外，朱善璐还提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问题，论坛对促进北京大学与其他世界一流大学的思想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北京大学希望能和其他世界一流大学一起，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知识和创造活力。

最后，李岩松宣布第14届北京论坛将于2017年11月3日-5日在北京举办，并代表北京论坛欢迎各位学者对下一届北京论坛的主题提出建议。在热烈的掌声中，第13届北京论坛圆满闭幕。（文/新闻网学生记者 原荣荣 吕正瀚 张立鹤）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第三届大学社会责任高峰论坛举行

2016年11月4-5日，由北京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大学社会责任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大学社会责任高峰论坛是大学社会责任网络的重点项目。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余位学者出席论坛并就大学社会责任文化构建等重要议题交换意见。国内外20余所高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会并发言，10余所北京高校学生工作部门负责人及100余名学生参加本次论坛。

11月4日上午，校党委书记朱善璐会见大学社会责任网络成员高校代表。他指出，大学有共同的责任，那就是通过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为世界、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进步发展提供智慧和思想。当今的世界，人类社会正面临很多挑战和问题，未来的希望可能就在于大学、在于教育。因此，高校在发展教育、构建文化和培养人文精神方面责任重大，高峰论坛的举办也非常有价值。

11月4日下午，论坛开幕式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为开幕式致辞。他指出，中国的大学一直有一种情结，要承担起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的责任，一方面，教育学生在学习时和毕

业后承担起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大学自身在发展建设中也要承担起对社区、对地方、对国家的责任。培育学生成为未来领袖是大学最大的社会责任，让他们真正了解自己、了解社会、了解世界，并为未来世界发展作出应有贡献，支撑社会、服务社会甚至引领社会是大学非常重要和艰难的任务，需要高等教育者和管理者的共同努力。



林建华为开幕式致辞

香港理工大学校长唐伟章在致辞中表示，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以及各项全球性的挑战，促使世界各地大学跳出传统教研的既定框架，重新厘定其角色和责任，以期增加对社会的影响。他指出，大学社会责任网络成员高校正是抱着世界日趋公正、包容、和平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



同愿景，推动各方合作，开展了包括高峰论坛在内的多个合作项目，积极推动大学研究、践行社会责任。

开幕式后，来自全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界领导和学者通过校长圆桌会议交流意见，分享了对于大学社会责任的想法，探讨了大学社会责任的远景和实践，着重交流了亚洲大学社会责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香港理工大学校长唐伟章、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阮曾媛琪先后担任讨论环节的主持人。

围绕社会责任的核心使命，柯炳生提出，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为社会提供原始创新成果是大学的核心使命，也是大学社会责任的根本体现。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呼吁大学在关注传统社会责任基础上，更关注可持续发展。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史宗恺认为，高校最大的社会责任是要为社会培养能够推动国家、民族、文化或是文明发展进程的优秀人才，应营造、树立和践行公益意识和社会责任的浓厚氛围，并通过培养的学生影响社会的价值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吴付来则指出，大学社会责任关键在于结合国情校情，培养积淀厚重素养的领袖人才，将社会责任落到实处。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林东伟提出，大学应实现从满足知识传播

需要，向满足学习者个性化发展的转变，及由接受性学习向探究性学习转变。中国海洋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张静谈道，以优势的特色学科推进人才培养，倡导建立“未来海洋青岛共识”，履行社会责任。石河子大学党委副书记夏文斌认为，人才培养是高校的第一功能，贯穿于所有功能之中。台湾成功大学校长苏慧贞认为，高等教育环节最主要的教育效果是提升学生精神世界和社会责任感，让其融入社会。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副校长朴仁辉认为，作为专门的女子大学，梨花女子大学超越纯粹培养学位毕业生，致力于培育全球女性领袖，充分善用一切可用资源，提供最佳的教育。

围绕社会责任培养的实践，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叶静漪结合“鸿雁计划”和“弥渡帮扶”，分享了大学服务地方发展的做法。四川大学副校长晏世经介绍了和港理工共同建立的全球第一个灾后重建项目及面向学生的防灾减灾教育。曼彻斯特大学助理副校长詹姆斯·汤臣介绍了大学将卓越的研究、教学和社会责任作为学校相辅相成的三大支柱目标。京都大学行政副校长北野正雄介绍了大学通过校际合作和培训项目来促进学生学为所用的做法。康奈尔大学副校长朱迪思·阿普尔顿介绍了大学在 150

年来，一直将社会责任的培养融入教学，开展课程设计，鼓励学生参加多种社会项目和活动。塔夫斯大学提舒公民生活学院始创院长及塔瓦尔网络荣誉总监罗伯特·霍利斯特认为，通过融合、新的组织结构、领导力三个战略可以实现社会责任的培养。比勒陀利亚大学学务副校长诺曼·邓肯介绍了学校通过社区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课程、建立协作系统共担社会责任的做法。圣保罗大学副校长马塞洛·罗梅罗介绍，圣保罗大学自成立之初就承担了培养科技人才的社会责任，发挥大学文化中心的作用，支持文化延伸到社会服务，发挥自己的作用。格里菲斯大学校长伊恩·欧康纳介绍了大学面向社区开展的儿童教育和气候变化项目。金边皇家大学副校长乌姆·拉维介绍了学校积极培养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人才，输送毕业生服务国家发展的做法，希望未来各高校能进一步合作，促进大学社会责任的发展。文莱达鲁萨兰大学副校长哉斯·提奥介绍了该校2009年推出以学生为中心的Gen NEXT计划，培养学生所需的关键技能及扩展他们的环球知识，开展学生交流、培育计划、实习以及社区外展项目，丰富学生在课本以外的经验学习。

今年的高峰论坛还首次开设独立的学生论坛。11月4日，来自大学社会责任

网络成员高校的多名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分享了对于大学社会责任的想法和参与相关实践活动的经验，随后在北京市内进行参访体验。

11月5日，论坛进入全体讨论环节，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首先致辞，指出要在育人过程中，注重全方位培育学生社会责任感，引导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意识。“责任”不是一句空谈，既需要通过教育“内化于心”，也需要通过实践“外化于行”。唐伟章指出，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大学发展的重要议程，学生通过为社会服务扩大视野，培养责任意识，应用专业知识帮助别人，提供改变生活和他们人生的途径。

随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高等院校的社区参与：政策与实践”“透过服务学习培育明日领袖：策略与成效”和“建设救灾能力：大学生走在社区最前线”等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静、曼彻斯特大学国际应急医药学东尼·雷德蒙德、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沈文伟博士、塔夫斯大学罗伯特·霍利斯特、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部长及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陈东敏、香港理工大学助理副校长石丹理分别担任各环节的主持人。



各高校分享了组织学生广泛进行社会实践和社会建设，建立实践基地，帮助当地人解决需求，参与当地建设，开展知识下乡、法律援助、环境保护评估等实际工作，助力社会发展的丰富多样的做法。如北京师范大学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介绍了日常开展的防灾减灾教育活动；复旦大学介绍了书院模式的探索；中国海洋大学介绍了设置助学公益岗，引导开展服务学习的做法；东南大学介绍了借鉴古希腊学园文化，以大学科研计划提升大学生科研素养，努力建成课堂教学、文化帮扶一体化创新创业实践平台；香港理工大学介绍了发展的四川社会心理学工作模式，着重因应灾区的环境和文化需要而提供服务，并介绍了应用跨学科模式进行减低灾害风险的研究；华盛顿路易斯大学介绍了公民责任领导力的课程，通过课堂教学促进社区参与；以色列海法大学通过开展跨学科研究，提供国际课程，教育年轻人学习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和方法；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介绍了重点致力于社会责任的“2025 战略”，着重提升社会参与和社会影响。

随后，学生代表汇报分享了对大学生社会责任的想法和体验，北京大学代表介绍了为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组织的“大手拉小手”夏令营及开展志愿服务的经历，

香港理工大学代表分享了在金边开发低成本计算机的故事，四川大学代表介绍了走在灾害教育前沿、服务社会发展的经验，北京师范大学代表介绍了小白鸽青年志愿者协会开展的支教、京师公益讲堂、重大赛事服务等活动。

最后，叶静漪、阮曾媛琪分别致闭幕辞，对各高校交流的经验做法进行梳理和总结。

11月3日，叶静漪还参加大学社会责任网络执委会会议，与成员一同研讨如何更好地推动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近年来，大学社会责任网络成员高校致力于推动大学生群体参与应对世界挑战，与社会各界共同建设人类美好未来。通过本次论坛，各高校围绕培养优秀学生、服务社会进步、助力国家发展等社会责任展开讨论交流，达成共识，未来将进一步发挥自身的科研优势和专业所长，将大学社会责任的愿景转化为行动。

背景资料：

大学社会责任网络于2014年底正式成立，旨在有效推动大学社会责任的发展及促进高等院校在大学社会责任方面的协作创新，秘书处设在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是网络的创始成员高校。创始成员高校共10余所，其中中国大陆地区

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三校。该网络通过共同进行学术研究、轮流办会、开放奖学金申请、互派访问学者项目和创立专题网站等各种合作形式实现经验交流和资源共享。大学社会责任高峰

论坛每年一届，第一、二届均在香港举办，今年首次在内地举办。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大学堂”讲学计划】著名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教授访问北京大学

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著名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系与社会学系教授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于2016年10月16-30日到访北京大学。访问期间，安德森教授共作了四场学术演讲，从历史与比较的视角，对国际体系、国际主义的流变、以及国际法秩序等主题进行阐释与批评。此次访问由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共同承办，并得到光华教育基金会的赞助。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担任讲学活动主持人。

佩里·安德森是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政治家，被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誉为“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自1962年起长期主持国际左翼核心期刊《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的编辑工作，并参与创办左页（Verso）

书局，显著提升了英国左翼知识界的理论水平及在公共领域中的影响力。他还曾于80年代任教于美国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安德森教授迄今共出版12本专著，对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其中1974年出版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是广受赞誉的历史社会学经典之作。2015年，安德森教授推出新著《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其中文简体字版也已在近期推出。



安德森近照

10月18日晚，安德森教授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首度开讲，并邀请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教授担任评议人。本次讲座题为“大国协调：十九世纪”（The Concert of Powers: the 19th Century），主要讲述维也纳体系的特点与命运。维也纳体系即欧洲协调机制（the Concert of Europe），是由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五大欧洲强国于拿破仑战败后创立的、西方第一个有组织的跨国体系。安德森教授指出，维也纳体系的两大目标是维护王朝帝制和防范大国之间战争，其运转则依赖于频繁的外交会议、分歧的解决和共识的达成，以及必要情况下对武力的动用。至于合作的基础，尽管五国差异巨大、力量不等，但正统主义（legitimism）是其统一的合法性标准。在此体系之下，那不勒斯、希腊、西班牙、比利时等地的革命被纷纷镇压。就此，安德森评价道，该体系的关键在于以稳定的政治合作取代简单的力量均衡，从而极为成功地实现列强的协调，使欧洲直到一战前都基本保持和平状态。不过他还指出，在这一体系之外存在两大异数，即经历去殖民化进程的美洲和疆域辽阔但日益腐败的奥斯曼帝国，而后者引发的包括克里米亚战争在内的一系列冲突重创了

维也纳体系的稳定性。安德森教授接着对维也纳体系的瓦解过程进行分析：德国实力增长、列强摩擦增多、一战爆发、俄国革命，欧洲协调机制彻底崩溃。就此他评价道：政治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分解的不明确，最终引发前所未有的人类战争。但一战前种种被称为“自由的文明”（liberal civilization）的元素却存留到了我们的时代。



10月20日晚，在题为“大国协调：二十一世纪”（The Concert of Powers: the 21st Century）的第二场讲座中，安德森教授以本世纪与19世纪的对比为基本方法，开启他对当今世界的观察。该次讲座邀请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担任评议。讲座开始，安德森总结了两个世纪的共性，指出外交会议、国际组织、作为“文明标准”的人权话语、打着不干涉旗号的政治与军事干涉以及大国特权，都令人想起过往的政治格局；而欧盟、俄罗斯、印度、美国、

中国五国的异质性也毫不亚于维也纳体系的构建者们。不过，对经济失控威胁与生态系统危机的防控成为 21 世纪新的协调基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务实性原则统一着“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奥斯曼旧帝国的统治区域仍是威胁世界和平的动荡地带。五国并非势均力敌——美国形成前所未有的全球霸权，干涉其他列强的势力范围。其欠下的海量债务恰好与外国债权国实现利益捆绑，另外两项优势是普适的自由意识形态和不与竞争对手接壤的地缘政治红利。总之，新的大国协调机制在本世纪初似乎已现端倪。关于新体系与 19 世纪的最大差异，安德森认为，新霸主美国及其同盟者羞辱了冷战的失败者俄国，造成后者强烈的反弹。而在其他三国，挑战与机遇并存。协调机制的继续发展以全球性的后现代资本主义为物质基础，以保存实力为制度目标。不过，在力推自由市场原则之外，当代霸主美国还欲实现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同质化。最后，安德森从社会内部权力体系的角度，以葛兰西的强制 (coersion) 与同意 (consent) 结合理论考察新时代的霸权走向，并意味深长地指出未来国际秩序发展的两种可能走向：一是康德设想的通向永久和

平的共和国联盟，二是考茨基所言的“超帝国主义”。

在前两讲对国际秩序史的回顾的基础上，在 10 月 21 日下午的第三场讲座中，安德森教授以“民族主义的他者” (The Other of Nationalism) 为题，讨论了国际主义的流变。他将民族主义的演变史作为对照，采用分时期的方法，阐述了国际主义演化史中曲折反复的七个阶段。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教授在讲座后进行了评议。安德森教授首先阐明，国际主义这一模棱两可的概念需要对照民族主义加以把握。在历史的研究方法上，他将国际主义的历史样态与同时期民族主义的理想型对应起来，通过适当的简化和剪裁，梳理二者主导类型的演变过程。安德森接着回顾道，起初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孕育了世俗的民族情感，政治上的爱国主义以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为特征，并与国际上的普世主义在价值和实践层面相契合。拿破仑战争导致了两者的反动版本的产生，资产阶级以欧洲浪漫主义为民族主义的修辞表达诉求。对文化多样性的重视维护“差异化的普遍主义” (differentiated universalism)，政治上的成就则体现于 1848 年的欧洲革命。与此相对的国际主义实践是第一国

际：其参与者多是有跨国流动能力的独立手工业者，国内战争因此得到国际化。19世纪60年代后，民族主义主导的各国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突变为沙文主义。它以实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为话语，强调族群适者生存。国际主义的表现形式则是第二国际：但其组成者难以抵抗本国意识形态影响，各社会主义政党在一战后纷纷背叛承诺、加入战争。而在一战结束后的经济危机中，战败国成为新的民族主义中心，法西斯主义基于非理性主义把民族界定为一个生物上的共同体，即种族（race）。与此同时，国际主义也以苏联成立和第三国际建立为标志走向绝对化。但第三国际最终屈从于苏联的利益，并于二战时期解散。二战结束后，资产阶级鼓吹民族主义、劳动阶级支持国际主义的传统格局被颠覆，民族主义以反帝国主义（anti-imperialism）为主导，将中心区域转移到第三世界。而在资本主义阵营，大国调和实现商业、意识形态和战略决策的统一化。196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多边合作机制，跨国企业纷纷建立，国际主义走向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模式。与此同时，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加速消弭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因素，民

族主义激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冲突。至于今日，安德森最后分析道，分离主义成为后冷战时代流行的民族主义形式，金融市场成为资本国际化的先锋，“国际主义”则在美国的超级霸权之下具有了弥赛亚式的普遍主义的色彩。

10月25日晚，佩里·安德森教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报告厅进行题为“国际法：它是国际的吗？它是法吗？”（International Law: Is it International? Is it Law?）的最后一场讲座，分析国际法的起源与性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Tony Carty、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平、陈一峰等三位国际法学者在演讲后做了评议。对国际法的发展过程，安德森教授梳理道，在16世纪，西班牙神学家 Francisco de Victoria 首次将西班牙对印第安人的征服之权诉诸贸易和传教等沟通的权利（communicandi）。17世纪，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以惩罚的权利（iusgladii）为理论基础，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长对葡萄牙商船的打击正名。霍布斯提出欧洲人应压缩渔猎和采集部落占据的土地范围，而洛克则发明劳动财产权的概念，论证欧洲人为改善土地利用而攫取印第安人的资源是正当的。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并未试图反对欧洲人对其他大洲

的殖民掠夺行动，瓦泰尔的《万国公法》是一典型。19世纪，维也纳五强格局固化国家间的等级秩序，“文明标准”（standard of civilization）的提出则将这种等级延展至“犯罪国家”“失败国家”和中国等处于欧洲文明之外的国家。20世纪初的海牙和平会议建立以美国和欧洲列强为常任理事国的国际仲裁法庭。一战后的国联结构仍在结构上排除主权国家平等的方案，导致多个拉美国家的最终退出。这一时期，奥本海和劳特派特等国际法权威也以肯定的态度承认国际法是列强霸权的体现。二战之后，安理会五强在联合国享有特权，国际法不再是欧洲的国际法，但却仍是西方（美国）的国际法。关于国际法的性质，安德森观察到，早期国际法以宗教色彩强烈的自然法理论作为基础；19世纪后，国际法的正当性转移到普遍人性，却受到人类学和比较社会学的挑战。事实上，正如英国思想家们所指出的，国际法是意见（opinions）和情绪（sentiments），其背后缺乏权威的支撑，而所谓的习惯法是通过不断违法而发展的。二战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的建立改变不了以上判断，国际法治仍充满不确定性和歧视性。而在当代，安德森结合若干实例说明，作为“意见”

的人权话语蓬勃发展，而列强则继续以国际法为工具实现自身利益。他总结道，国际法既非国际，亦非法律。其本质是服务于霸权及其同盟者的意见或意识形态——当然，是一种具有重要力量的意见。

安德森教授与中国渊源颇深。其父曾于中国海关任职，其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出生于昆明，其本人也曾在幼年时期于居住于上海。此次访华行程期间，安德森教授与北大师进行了深入交流。讲学期间，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在临湖轩会见了佩里·安德森教授，并向他颁发了“大学堂”讲学计划邀访学人证书。从大国协调机制到当代霸权结构，从国际主义流变到国际法秩序，安德森教授以其广泛的兴趣与深刻的洞见，展示了一位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风采。



吴志攀向安德森颁发“大学堂”讲学计划邀访学人证书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林建华校长实地察看北大创新创业中心和二教协作学习空间

2016年11月7日上午，林建华校长在基建工程部、房产部、校友工作办公室、教务长办公室、党办校办、校团委等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察看了第二教学楼两个创新空间——北京大学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以下简称“双创中心”）和北大树下协作学习空间（以下简称“树下空间”）的建设工作。



林建华校长察看“双创中心”建设情况

林校长一行首先参观了“双创空间”创业讲堂、创意设计展示区、创业孵化器和室外下沉广场等功能区，基建工程部莫元彬和校友工作办公室李宇宁简要介绍了“双创中心”的功能布局、施工进展、服务规划等基本情况。

林校长指出，当前，创新创业教育已经成为大学教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影响

大学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校声誉的关键因素，希望“双创中心”能够为在校大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平台，成为优化校园创新创业环境、弘扬创新创业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为培育勇于创新、宽容失败的创业家精神的摇篮。

“双创中心”的建设是北大服务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的核心项目，同时也是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重点工程。项目充分利用第二教学楼地下空间，占地近5000平方米，设计功能包括“新青年”创客空间、创业大讲堂、创业咖啡、创新创意设计展示中心和“极客”实验室等。



中心展示区

“双创中心”于今年3月经学校批准立项，7月正式开工建设，目前基础装修改造工程已基本完成，进入设备购

置和调试阶段，预计年底之前投入使用。中心的建设得到了北京大学企业界校友的大力支持。

据悉，“双创中心”作为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基地，将充分调动北大校友企业家资源，同时整合大学、地方政府、产业实体和金融机构等多种社会资源，全链条、全方位地构建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与此同时，中心还将积极推动以创新创业为主题的港澳台学生交流和国际创业资源的互动与整合，进一步扩大北大的国际影响力。



林建华校长在“树下空间”

随后，林校长一行来到位于第二教学楼三层的“北大树下协作学习空间”。

试运行第一天，这里已经吸引了不少师生，互动讨论的氛围非常热烈。“树下空间”由师生共建、共享，提供适合小组讨论和学术分享的协作学习环境，空间装饰由北大学

生参与设计并亲手绘制。同学们对这块闲逸舒适、充满艺术设计感的交流空间感到惊喜。林校长感谢各方朋友对北大“树下空间”建设的倾情奉献和大力支持，并希望这里成为北大人文新地标和师生互动、思想碰撞的新社区。



“树下空间”试运行

林校长强调，学校将进一步致力于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成长体验，建设“更好品质、更好品位的校园”。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拉丁

北京大学再次获得全国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绩效考评第一名

近日，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下发《2015年度学生资助工作绩效考评结果通报》，公布2015年度全国各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绩效考评结果，北京大学获得全国第一名，这也是北大连续多年在评估中获得第一名。在全国扶贫攻坚的重要时刻，北京大学在学生资助工作方面不断取得突破和进展，在探索学生资助模式的工作中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多年来，北大一直高度重视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通过“以评促建”建立五级资助管理体系，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包括经济资助、能力提升、发展机会等三方面的支持。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体系包括“燕园领航”“燕园携手”“优才拓展”等13个成长支持项目、7个经济资助项目，优先考虑建档立卡户学生、贫困专项计划学生和筑梦计划学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校长林建华、党委副书记叶静漪亲自担任“领航导师”，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成长上的帮助。北京大学的学生资助工作同时也获得了校内多方面的支持，除了绿色通道上的经济帮助外，北

京大学财务部、教育基金会为资助资金筹集和发放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学校的审计室、监察室、督查室、校长法律顾问办公室等单位为平时学生资助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监督指导；北京大学组织部、人事部、房产部、国际合作部、基建部等单位为学生资助工作的开展提供人员、场地和国际项目的支持；学生工作部、北京大学团委、就业指导中心、青年研究中心、心理咨询中心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思想健康教育和就业发展提供指导；教务部、科研部等单位为学生的学习发展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北京大学宣传部为学生资助项目的开展提供信息支持；党办、校办对于开展学生资助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指导；保卫部、总务部、体育教研部、会议中心、燕园社区服务中心、计算中心、信息办、档案馆、校史馆、图书馆、校友办、实验室与设备部、统战部、餐饮中心、动力中心、校园管理服务中心、公寓服务中心、百周年纪念讲堂、邱德拔体育馆等单位为学生资助活动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另外，各院系负责学生资助工作的老师，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评选认定的和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的个性化培养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正是通过学校各方的努力，北京大学学生资助工作获得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一致好评并不断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学生资助工作的开展，主管领导叶静漪提出“新思维”“新过程”和“新模式”，要求积极探索学生资助工作的新模式。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提供专门机构、专业人员、专项经费、专门场地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成长成才的保障，这一模式获得了学校各个部门的支持。此外，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还与全国 32 个省份的学生资助管理单位、百余所高校和中学的学生资助部门积极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借鉴各方的经验，参与推动全国学生资助体系的完善。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基金会也为资助工作的展开提供资金相应的帮助，因此北京大学此次荣誉的获得是校内各个部门以及校外各界积极配合、共同努力的结果。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学生资助工作是教育扶贫的重要手段，建立完善的学生资助体系是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也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希望工程、民心工程。北京大学创新工作理念和方式，探索新的工作模式，构造全覆盖、全过程、全方位、全成才的服务型资助与育人模式，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北大风格的世界一流学生资助体系。同时，北京大学学生资助工作的积极开展和完善，是响应扶贫攻坚战略的重要举措。伴随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生资助体系的建立，更多困难家庭的孩子将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平等竞争中拥有上升通道、释放创造潜能，从而真正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2016 年北大-斯坦福论坛开幕

2016 年 11 月 4 日，第二届北大-斯坦福论坛暨 2016 年北京论坛教育分论坛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拉开帷幕。本

届北大-斯坦福论坛的主题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制度的视角”。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英国、俄罗斯、芬兰、日本、韩国、菲律宾、巴基斯坦，以及中国香港和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 40 余位大学校长和学者、国际组织专家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组织、管理和发展等重要问题。



论坛现场

论坛开幕式由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主任戴慕珍 (Jean C. Oi) 主持。戴慕珍，斯坦福大学副教务长 Ann M. Arvin 和中国教育发展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名誉院长闵维方在开幕式上致辞。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阎凤桥作题为“从国家精英高校到世界一流大学：制度逻辑思考”的开幕式报告。

戴慕珍在致辞中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她指出，在过去 5 年中，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不仅为斯坦福大学师生了解和研究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同时也为中美两国乃至全球

优秀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平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成为各国增强国家竞争力、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战略，论坛为更加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戴慕珍感谢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对本届论坛的支持，并预祝论坛圆满成功。

Ann M. Arvin 在致辞中指出，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全球趋势的背景下，如何在 21 世纪推动大学更好地践行使命和愿景，已经成为大学管理者共同关注的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更多优秀学者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届北大-斯坦福论坛为全球顶尖学者提供了交流和讨论的机会。Ann M. Arvin 对北京大学的支持表示感谢，并期待与会嘉宾就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闵维方在致辞中指出，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以及网络社会和知识经济崛起的背景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并且成为提升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战略举措；通过聚集优秀学者、寻求真理、推进前沿研究，大学不仅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同时也是提供文化产品、价值观和信念的基础。但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相对浅层次的技术方法和资源配置受到

了广泛的重视，而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却被忽略。第二届北大-斯坦福论坛力图将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考从表层的技术关注转向更深层次的制度探讨，从而深化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理论认识，促进实践探索。

阎凤桥基于同闵维方的合作研究，就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制度问题作开幕式报告。阎凤桥指出，院校自主、学术自由等传统价值观十分重要，适当分层有益于提高高等教育整体质量，世界一流大学是推动高等教育国际竞争的重要动力。后发外生型国家发展高等教育，除了需要财政支持以外还需要制度改革。由于制度惯性，后发外生型国家高等教育价值观和信念等深层次变革要慢于表层的正式规则变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从制度视角进行深入探讨。

本届北大-斯坦福论坛得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高等教育教席、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和北京论坛的大力支持。与会大学校长和专

家学者围绕“不同制度环境下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化与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制度背景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组织结构”“制度环境形势下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特征”和“世界一流大学与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四个议题开展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论坛首日，宾州州立大学 Roger L. Geiger 教授、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伦敦大学学院 Simon Marginson 教授、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院长 Lloyd B. Minor 四位国际著名学者发表主旨演讲，就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教师-学生-科研内在联系、大学治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大学排名等问题发表独到的见解，指出大学办学不应为排名所引导，大学应当保持自己的组织特征和必要的传统，在自主权、问责与学术自由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江南

北京大学与伦敦大学学院签署“中文培优项目”合作备忘录

11月2日上午，伦敦大学学院（UCL）教育学院孔子学院2016年理事会在北京大学临湖轩召开，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对外汉语教育学院院长赵杨，北大附中党委书记生玉海，伦敦大学学院副校长Nicola Brewer、校长助理兼孔子学院院长杜可歆作为理事会成员出席会议。

会上，双方回顾了过去一年该孔子学院取得的成绩，通过了2017年工作计划。2015年，该孔子学院在课程数量、学分制学员和非学分制学员人数、在职教师和兼职教师人数等方面都实现了有效增长，在线学习、混合学习、沉浸式课程等多种模式受到学员热烈欢迎。

理事会上，大家重点讨论了“中文培优项目”（Mandarin Excellence Programme, MEP）的推进措施。“中文培优项目”是英国政府旨在促进中文教学的教学科研项目，由UCL教育学院孔子学院与英国文化委员会承办。该项目投资一千万英镑，目标是2020年前培养5000名高水平的汉语学习者。

为有效推动“中文培优项目”实施，双方决定在以下五个方面开展合作：（1）为英国的汉语教师提供汉语语法慕课课程；（2）合作研究英国中学生汉字习得，

研发增进学习效果的教学方法；（3）开发暑期强化学习课程教学资源；（4）如有必要，研发等级评估及测评标准；（5）为汉办教师和英国本土教师提供培训。UCL教育学院孔子学院希望借此契机，克服体系阻碍，将更多学校纳入“中文培优项目”，通过有效、可持续的汉语教学，提高英兰格中小学汉语教学质量，提高汉语学习者人数。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希望通过该项目的合作，促进教学和科研，提升北大在汉语教学领域的影响力。

理事会结束前，李岩松和Nicola Brewer代表双方签署“中文培优项目”合作备忘录，并指示UCL教育学院孔子学院和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成立合作团队，推进该项目的落实。





背景链接:

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前身为英格兰
专长学校联合会孔子学院）成立于 2006
年，由北京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共同承建，
是英国第一所以中小学为基础的孔子学

院。迄今为止，UCL 教育学院孔子学院已
经设立了 45 家中小学孔子课堂。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网教之声

在线教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慕课

“慕课是印刷术发明以来最大的教育革新，更重要的是，它将改革大学教育，重塑高等教育版图。”上海交大校长、中科院院士张杰曾对慕课做出如此评价。自2014年前后学堂在线、中国大学MOOC平台相继上线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大等著名高校开始参与慕课内容提供，至此已有超过30所“985”高校及多所“211”高校参与慕课课程的制作和慕课平台的建设。“慕课”热潮也由此而起，那么当前国内慕课行业的发展情况究竟怎样呢？

伴随“慕课”热潮，千万学习者加入慕课学习大军，一起来看看他们对于慕课课程有着什么样的需求？

慕课目前的用户规模及用户情况介绍

用户规模即将突破1000万：2014年前后，国内学堂在线、中国大学MOOC等核心慕课平台相继上线后，中国慕课用户规模开始飞速增长，根据HCR慧辰资讯估计，2016年用户规模将突破1000万人。

用户以年轻高学历者为主：从地域上看，当前慕课用户主要分布在一、二线城市；年龄上，用户相对较为年轻，约50%为90后，渴望了解和学习新知识，拥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用户的学历水平普遍较高，约80%用户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用户希望通过慕课学习拓展知识，对于优质课程内容需求重：约70%的慕课用户都想通过慕课学习拓展知识面。课程资源的丰富程度是用户在选择慕课平台的重点关注因素。学生用户倾向于接触更多优质资源，将慕课作为课堂的补充，以选择高等教育、考研类课程为主；职场人士则为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去学习慕课，主要选择职业技能类课程。受慕课平台大多为免费开放课程的影响，目前仅有约20%的用户在慕课课程学习的过程中有过付费行为，且付费金额普遍在300元以内，多数是为取得慕课学分/学位认证而付费。

用户对于慕课的强烈需求及慕课用户规模的飞速增长，刺激慕课行业的发

展，慕课企业的发展也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标。慕课内容的提供，课程的制作、平台的搭建都需要专业企业参与，HCR 慧辰资讯梳理出当前国内慕课产业链图谱，具体如下：

慕课产业链图谱、平台类型和代表企业介绍

当前慕课产业链主要涉及技术支持方、内容提供及运营方、行业监管方这三方。内容提供及运营方中的慕课平台是连接 B 端内容提供方和 C 端用户的桥梁，是产业链中的核心环节，目前国内慕课平台主要切入高等教育慕课领域，针对初等教育及职业教育领域的慕课平台尚少。慕课平台主要采用企业与高校合作的模式，高校提供内容，企业提供平台和技术，从企业运营模式上分为慕课企业平台和导航平台两种。

慕课企业平台主导内容整合和运营。一端是向上游内容提供商高校采购/置换课程资源到平台，另外一端是面向用户提供课程学习服务。这类平台根据参与企业背景的不同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拥有高校、政府等官方资质的平台，代表平台为学堂在线、好大学在线和华文慕课。这类平台不仅仅是具备其他合作高校的内容资源外，自身特有的内容资源也成为其一大优势，例

如学堂在线拥有的清华大学慕课唯一授权，令其用户中学生比例较高。

第二类是互联网企业背景较强的平台，代表平台为中国大学 MOOC、顶你学堂、智慧树网。这类平台由有互联网企业专业主导运营，加上自身的技术背景，往往具备较强的运营优势，同时互联网企业天然背景优势带来的用户流量，令其用户覆盖面较广。

慕课导航平台主导用户导流及推广。慕课导航平台是伴随慕课企业平台应运而生的，当用户在学习慕课过程中面临的选择过多时，导航平台通过分类能带给用户更好的体验，同时，慕课企业平台也通过导航平台进行引流。当然导航平台本身积累的用户规模与用户属性是其发展的最大优势。

慕课的价值

价值 1：教育普惠，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和渠道接触优质教育资源。在慕课出现之前，人们只能通过线下学校机构接受体制内教育，同时通过其他在线教育形式辅助练习、辅导等，不仅在学习时间、地点上受限较大，还受制于自身的年龄、学历等因素。慕课的出现将原有的体制内优质教育资源在线化，一方面增加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渠道，使得人们不仅可以通过传统线下传统机构

学习，也可以通过慕课平台在线学习，另一方面扩大了接受优质教育的人群范围，使不同年龄、种族、地域的学习者都可以通过慕课平台接受相同的教育。

价值 2：通过慕课平台搭建，推动学校信息化建设。在慕课出现之前，学习优质课程内容资源部分存储在校内信息系统内，大部分还存储在教师个人手中，尚未形成完整规范的信息化系统，且各学校之间互不相通。慕课出现后，鉴于教育部对慕课的重视，部分学校开始通过请课程资源平台或其他第三方搭建慕课平台，这些慕课平台的搭建一方面使得优质课程资源得以规范化存储和管理，另外一方面完善学校内的课程资源体系建设并与外部资源的对接，整体上推动学校的信息化建设。

价值 3：线下线上教育有机会融合，互相依托，提供更好的教育体验。传统线下教育能够集中优质教育资源，提供面对面的教学及辅导，拥有成熟的教学管理体系，但也存在管理效率低，普惠人群有限等问题。未慕课化的在线教育推进了教育资源共享的理念，弥补传统线下教育在时间空间上受限的弱点，但在整个在线学习过程中尚存在互动不足，反馈不及时，学习效率低下等问题。慕课的出现，一方面使得传统线下优质资源在线化，拥有“在线学习”的优点，另一方面也使原有的在线教育形式慕课化，完善其在教学管理、辅导和互动上不足。促进线下和线上教育的相互融合，形成依托关系，提供更好的教育体验。

来源：新浪教育

编辑：丁香的耳朵

在线教育的春天

教育的本质是人的自我提升和自我实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潜能，教育就是为了挖掘这种潜能。相较于传统教育的形式，在线教育能够让用户以尽量低的成本、尽量便捷的方式来挖掘和实现自己的潜能。

在线教育的春天已经到来

现在教育市场活跃着两种力量，一种是传统的、根深叶茂的教育集团，凭借多年来的用户积累，依托以线下教育为主，线上为辅的方式实现营收的快速

增长，例如新东方集团去年规模百亿左右，好未来去年大概 40 亿；还有一批年轻的，专注于做在线教育的新兴企业，有道也是其中之一。这类型企业一年的营收规模是几个亿，正处在开疆拓土的过程当中。

这几年也不乏有人质疑——就靠着这几个亿的体量，在线教育真的能做大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特别是对于纯在线教育而言。我们对在线教育非常看好，而且网易做得全是线上，几乎没有线下部分。我们认为 2016 年至 2017 年的时间点，纯粹的在线教育产品的繁荣期已经到来。

首先，大众对虚拟产品的支付意愿迅速提高。网易代理暴雪的 PC 游戏《守望先锋》上线一个月给网易游戏带来了 6 个亿的收入；网易云音乐发行了《周杰伦的床边故事》预售不到两个月，卖出了 36 万张。这些数据能够看出，新一代的消费者对于虚拟商品的购买意愿很强烈，对稍高的销售单价也能够接受，这对于在线教育是一个重要机会。

第二，越来越多的“网红老师”聚拢大量学生，带来流量推动在线教育发展。这些老师教学能力强、颜值高、善于做社群运营、懂得如何去创业。

第三，辅助技术成熟，通过增加聊天机器人、批改系统、背诵监测、口语练习等辅助技术，大大提升了用户满意度或者学习效率带来竞争力。

第四，广告变现在教育产品中越来越成为一个有效、有规模的收入来源。有道词典的千次广告展示收入能够达到 30 元，这在各类 APP 中都是非常高的。

第五，内容驱动的在线教育模式以定价相对合理、标准化、大量发行的付费课程为核心，催生了较高的付费转化和规模经济。有道公开课的付费课转化率是 15%，从付费课到续班的转化率能够达到 30%。

在线教育的两种做法

目前在线教育有两种被检验过的成功做法：一种和线下教育的做法在原理上相同，另一种是在线上建立全新的模式。就当下来看，两种做法都能做，但模式各不相同。

具体来说，客单价在 2000 元以上的教育产品，可以认为是体验与销售驱动模式，他们的客单价较高、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这个模式在线下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在线上也有 51 Talk、VipABC、VipKid 这样的实践者，业务增速很快。2000 元以下客单价的模式，具有标准化、

规模化的特点，是由内容驱动产品探索出来的新生市场。

对于有大量用户资源的线上企业来说，内容驱动模式是个更优的路径，通过课程的规模化和标准化，用高品质的内容吸引用户，实现业务的迅速增长。

不过，纯粹依靠技术变成独立的教育产品现阶段非常困难，消费者不买单。现在可以做的是在内容里加入支撑的技术，使得内容更加强大、消费者体验更好、学习效率更高、节省大量教学的人力。比如，在一个课程体系下使用自动批改既能推动用户口碑，还可以加强后续产品销售。但如果单纯让用户下载、付费，纯粹靠技术把产品做大，现在还做不到。

当我们在内容里加入技术，技术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所有新技术的发展路径都是这样。现在从事在线教育的各个机构都面临技术变革问题，只是有些人选择拥抱，而有些人选择在边上看着。

网易有道的选择

网易是互联网公司中涉足教育最早的，从2007年推出有道词典，之后尝试了公开课、云课堂、有道精品课等各种产品。我们探索了很久，有道的模式就是是内容和技术相结合，即以标准化的教育产品及内容为核心，以技术为支撑

的模式，课程单品价格范围在100元至2000元。以四六级产品为例，今年前几个月课程就已经卖了10多万份，这就是互联网的力量。我认为衡量一个产品是不是真的产生价值，就是“对每一个人产生多少价值乘以影响了多少个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这块更为关注。

在标准化生产中，内容制作的成本比较重，一方面，引入名师团队有比较高的成本，另一方面，教研教务要花很多工序做出来，从内容、包装，到设计，质量要求都非常高。和其他在线教育平台与教师团队的松散合作模式不同，网易有道选择和老师团队进行长期深度合作的形式。因为教育是不可逆的过程，如果制造了不好的教育产品，对用户伤害非常大。很多综合平台对教育产品内容打磨不够，让用户去做小白鼠，教育效果适得其反。

网易有道挑选优秀的老师团队在内容上合作，提供资金和流量，最后通过销售变现进行分成。我们计划未来两到三年时间投入5亿元，做20个教育工作室，把目前做的几门成功的课程变成几十门成功的课程，打造丰富多样的有道精品课。

更远一点说，互联网让非常多的职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这个世界

不是特别需要很多巨大体量的公司了。公司的作用是降低交易成本，但如果公司到达了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相同的临界点，这个时候公司就不应该再变大。如果公司再扩大，整体工作效率就下降，甚至不如小型公司或者个人。我们认为教育应该是小团队作战，这样

就能够保持非常强的活力，所以我们的作用是给优秀的小规模教师团队提供具体的资源，整合这些资源，和他们共同打造优质的教育内容。

记者：安凌飞

来源：经济观察报

■ 北大人物

张益唐：数学给我带来幸福

张益唐，华人数学家，1955 年出生。1978 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在燕园度过 7 年时光，1985 年获北京大学硕士学位；1992 年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数学系，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数学系教授。

从无限到有限的跨越

2016 年 8 月的一个下午，我和北大 78 级经济系师兄田军来到位于中关村东路的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拜访 78 级数学系校友张益唐。中科院数学研究所邀请他每年回国两个月讲学和做研究。

张益唐这个名字，在三年前尚不为人所知，如今，他是国际数学界的一颗明星，声名遐迩。

2013 年 4 月 17 日，张益唐将论文《素数间的有界距离》投给全球数学界最具声誉的《数学年刊》，在解决“孪生素数猜想”这一百年数论难题的道路上，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证明了在数

字趋于无穷大的过程中，存在无穷多个之差小于 7000 万的素数对。

该论文被当今顶级的解析数论专家伊万尼克严格审核后，给予了如下评价：“这项研究是第一流的，作者成功证明了一个关于素数分布的里程碑式的定理”，论文在破纪录的超短三周内被《数学年刊》接受并很快得以发表。张益唐以新罕布什尔大学一个普通讲师身份，一鸣惊人，震惊了全球数学界。

张益唐教授位于中关村的这间办公室不大，一张书桌，一排书柜和一组简易三人沙发，简洁而朴素。续茶水的时候，张益唐会端着一个印有某次会议字样的白瓷杯，去楼道接开水。桌子上的演算本和稿纸，工整地写满了数字、符号和公式，显示出房间主人异于常人的意趣。

我们的话题自然从“孪生素数猜想”开始。

“我研究过数学领域的很多问题，只是在孪生素数领域获得了成功。如果把数学这门学科分为理论数学和应用数

学两大块，在理论数学中，很多尚未攻克的都是孤立的问题，它的解决不会对现实生活产生什么直接影响，但是在研究中建立的方法论具有非常高的价值”。

张益唐教授告诉我们，孪生素数猜想由谁提出已经无从考证，一种说法是两千多年前，由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提出，在数学史上有据可查的是 1849 年。160 多年来，对这个猜想的证实只到了函数级别，而这个函数是无穷大的。他的证明将函数变成了一个常数，也就是跨越了“从无限到有限”的巨大一步。

张益唐教授对“孪生素数猜想”的证明发表后，其科学价值迅速得到体现。全球多位数学家开始运用论文中的方法，尝试突破 7000 万这个数值。

张益唐论文发表后的两个星期，这个常数下降到了 6000 万，在之后两个月内，又雪崩式优化到 4200 万、1300 万、500 万、40 万，张益唐教授说，目前这个常数已达到令人吃惊的三位数，246。

同为北大数学系校友的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汤涛，将张益唐教授的研究成果所起到的作用形象地比喻为：从“大海捞针”缩小到“泳池捞针”，未来极有可能“碗里捞针”。

从已经发表的对张益唐的采访文章中，我们了解了博士毕业后七年的经

历。因为种种原因，他无法获得继续攻读博士后、或者进入学术圈的机会。那段日子里，他以打零工为生，居无定所，辗转各州，游离于学术圈外，数学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直到 1999 年遇上两位北大数学系校友——唐朴祁和葛力明的帮助，张益唐才得到了新罕布什尔大学编外讲师的工作，由于教学出色，2005 年成为该校正式讲师。

在新罕布什尔大学，他终于可以静下心来研究多年钟情的数学了。他平生的第二篇论文，关于“黎曼假设（也称黎曼猜想）”的研究，在这段时期发表在重量级的数学期刊《杜克数学》上。

他同时沉浸于“孪生素数猜想”，他说对数学难题的研究与最终的证明结果，往往只隔着一根头发丝的距离，而即使天分和运气都具备，跨越这样的距离，他也走了十三年漫长的岁月。

当我问到数学给他带来什么时，他微笑着说，“数学给我带来幸福，很难想象没有数学，我怎么过下去，现在还是这样！”

他用“清苦”概括自己研究数学的状况，却没有描述那些年生活的细节。他脑子里印象更深的是在音乐家朋友家度假，去院子里想看梅花鹿，梅花鹿没有出现，而灵感出现了的时刻。他说，

“我知道我找到了方法，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时刻！”那种豁然开朗，是数学给予他的激情和幸福。



我心里一直很平静

已过花甲之年的张益唐教授，身躯挺拔，头发乌黑，说话不紧不慢，浅蓝色衬衫上，挂着中科院数学院的胸卡，散发出温文尔雅的气质。他好像活在一个很干净的世界里，当下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环境，似乎没有污染到这片干净的世界。

他说，“我喜欢数学，这是个习惯，改不掉的”，“我按自己的习惯做下去，

能不能出成果想得不多”，“我享受这样的过程”。

我调侃道，您那么繁重的脑力劳动，为什么不生白发不秃顶？他说数学对他来说不是苦事。

他从小在上海由外婆养大，八九岁的时候，买了《十万个为什么》的数学分册。他清晰地回忆起第八册是《数学》，第七册是《动物》，第六册是《地质地理》。他还记得第八册花了六毛五分钱，他对数学最有兴趣。而我则惊讶于他对数字的镌刻般记忆力。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后来的中学数学知识是他自己找正规教科书学习的。不光数学，他阅读当时能找到的任何书籍，包括文学、历史、哲学。

在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前，张益唐说他已经在《中国科学》杂志上读过陈景润的论文，那是1973年。虽然对于年少的他，“哥德巴赫猜想”很高深，但不知为什么，他能看懂一些，知道那是组合数学理论。

进入北大数学系，他是公认的高材生，很受后来担任北大校长的数学家丁石孙先生器重。张益唐心无旁骛，没有享受过未名湖的花前月下，他说，那时候人很单纯，只知道学习。

这两年，张益唐获得了一系列国际数学奖项，如美国数学会弗兰克·奈尔森·科尔数论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皇家音乐学院、瑞典皇家艺术学院联合设立的罗夫·肖克奖；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等。当我问到他的获奖感受时，他说，“别人觉得我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觉得自己还是跟以前一样。”“我的心里一直很平静。”

问到他理想中的生活，张益唐回答，“越简单越好”，但是他并非苦行僧。他爱白兰地、威士忌和葡萄酒，也喜欢喝茅台。他爱音乐，喜欢古典音乐，尤其推崇勃拉姆斯。

北大赋予了我家国情怀

张益唐多次表示北大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而且赋予了他敢于去挑战数学巅峰难题的勇气。他说，当时数学系的学生追逐菲尔兹奖，物理系的学生渴望诺贝尔奖，这是北大人才有的自信。

他很感谢导师潘承彪教授将他带进解析数论领域，潘教授培养的严谨学风，使他在日后的研究中受益匪浅。

顺着这个话题，我问他怎么看待老一辈数学家与七八十年代培养出来的数学家的区别，张益唐回答，纯粹的数学

家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这一辈涉猎面和视野会更开阔，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当年陈景润用几麻袋稿纸来演算，后来才借助于一个袖珍计算器。现在的数学家可以用到人工智能，但是同样需要一个大脑和一支笔来演算。

两代人共同的地方是他们的家国情怀依旧，对科学的执着与追求不变，不管生活在哪个国家都一样。



按自己的方式定义成功

谈到成功，张益唐认为：成功的定义不是唯一，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按自己的定义获得了满足感、成就感便足矣。

虽然张益唐的同学们评价他是数学天分最高的人，但是他说自己当年在北大时并不是每次都能拿第一，用现在流行的词就是不应该被称作“学霸”。他想告诉学弟学妹们，当一个人出名后，

媒体的过度吹捧是不可信的。人人都有弱点，学术和生活的道路上都不会一帆风顺，所以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不可丧失信心。

他曾用杜甫的两句诗来形容他的命运：“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他不过分关注名利，也没有来自家庭的压力。在这个方面，他说，我最感谢的是妻子 Helen。两个人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不干涉对方，也不强求一致。Helen 不懂他的研究，但是曾经用朴素的语言表达过：“这个男人就这么点对数学的爱好，为什么要剥夺他呢？”

他觉得将“哥德巴赫猜想”当作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是一种文学上的比喻。数学领域的顶尖问题，无法简单地按难易程度排名，当你未得出结论的时候，所有问题的难度是一样的。攻克了“孪生素数猜想”对数学发展来说，与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都是非同寻常的大事。由于张益唐使用了新筛法，“孪生素数猜想”的进展，目前已经超过“哥德巴赫猜想”。

在张益唐心里，有 110 项研究成果的德国数学王子高斯、“费马猜想”的证明者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庞加莱猜想”的证明者佩雷尔曼都是他的

标杆。在研究“孪生素数猜想”的同时，他还潜心于同样位列“七大数学世纪难题”之一的“黎曼假设”的研究。他不愿意拿出阶段性成果来发表，他要求自己出手就是“大东西”。张益唐说，如果“黎曼假设”得以证实，数学领域中将有上百个问题迎刃而解。



解读数学之美

在中科院附近的餐厅吃过晚饭，我陪张益唐再回办公室。穿行在物理所和数学所林立的大楼之间，我突发奇想，这样规规矩矩的大楼会不会禁锢一个科学家的思维？张益唐显然对国内的情况颇有洞察，用一个提问来回答我，盖这些楼是因为研究经费需要花完吧？

他的研究方式似乎不是在书桌前苦思冥想，我随意问起他的作息时间，他的回答不禁令人莞尔。他作息规律，早睡早起，起床前在床上想一会儿数学问

题，似乎折磨我们的数学对他来说是放松。

张益唐坎坷的学术之路和曲折的人生，在过去的三年中已经有了许多的解读。乐于中国式皆大欢喜结局的人，欣慰地看到他现在功成名就，认为是对“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极佳诠释。对这位曾经的隐士更深入地发掘，会发现他让中国的学术界看到了一个特立独行的类型：游离于主流的数学界，成名前只发表过两篇论文，不在乎名气和物质，醉心于自己的爱好，最后一鸣惊人。在采访中，我所看到的是一个热爱数学，充满自信，脱离世俗的科学家。

这位享誉盛名后的数学家对未来怎么考虑呢？当我回来反复听采访录音时，深深打动我的，是张益唐说的这样一段话：“我觉得我还能继续做事情，数学领域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那些问题都非常难又非常重要，我尝试过很多种，有一些取得了部分结果。至于其它的，我没想那么多，我不喜欢出了名之后捞好处，我没那么想过，也不会那么去干”。

我注意到他反复说到数学之美，起初十分难以理解。当我追问，是不是如同音乐具有旋律之美，建筑具有均衡之美一样？他表示赞同。法国几何学家

E. cartan 说：“在听数学大师演说数学时，我感觉到一片平静和纯真的喜悦。

这种感觉大概就如贝多芬在作曲时，让音乐从他灵魂深处表现出来一样。”从张益唐学长身上，我也产生了同样的感觉。我还感受到了一种浪漫的理想主义。如同勃拉姆斯始终坚持古典主义形式创作音乐，因为没有达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水准，而迟迟不肯发表自己的《第一交响曲》一样。在张益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平静的状态背后，隐藏着某种理想，隐藏着一种通过追求学术巅峰，不负燕园、不负家国的内心世界。

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中，第四乐章是以“欢乐颂”的旋律，向“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致敬的经典篇章。如果按照传统交响曲快板—慢板—小步舞曲—快板的结构，把张益唐的人生经历写成一部音乐作品，我想，第一乐章如歌的行板，是燕园时光和在美国的普渡岁月；第二乐章：七年颠沛和十三年孤寂的学术生涯，犹如低沉的慢板；第三乐章：“孪生素数猜想的证实”及国际上的巨大反响，是快乐的小步舞曲；未来的第四乐章，也许是张益唐向数学大师致敬的华美篇章吧！

来源：北大校友网

编辑：王涛

何国琦：一路坎坷，不忘胸中山河

【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北大老前辈们用自己的人生为这种君子之风作了很好的诠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离退休工作部启动了“君子志道”专题访谈活动，走访了一批离退休老同志。

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神的深厚源长。本期“君子志道”访谈专题，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北大老前辈们的朴实与精彩。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

1957年5月7日，这支《勘探队员之歌》响彻中南海。这一天，刘少奇在接见原北京地质学院1957届毕业生代表时说他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号召同学们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实践中去锻炼，并把伏罗希洛夫元帅送给他的一枝双筒猎枪转赠给了学生代表们。这

个消息传到1956年刚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何国琦耳中的时候，他异常兴奋。毕业前夕的实习经历，让他对“建设时期游击队员”的生活已经有了一些别样的感受。

大漠西风，成就“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

1952年，新中国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这一年，何国琦刚满18岁。这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考入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和唐山铁道学院等院校的地质系合并组成的北京地质学院，开始了他为之奉献一生的地质生涯。

说起何国琦与地质学的结缘，可谓因缘际会。1952年适逢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刚刚合并的地质专业很冷门，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因为1952年国家号召学习师范和地质专业，也号召参军。我也是响应国家号召、追求进步，所以才选择了地质。”这个时期整个国家百废待兴、需要人才，很多热血国人都被召集到大学，所以校园里很多

人年龄差距特别大，有些是青年，有些是年龄稍长的退役军人。

1952年至1956年是国家经过3年的经济恢复、迎来经济建设高潮的时期，用“蒸蒸日上”来形容当时的国内形势是最恰当不过的了。社会主义事业开展得如火如荼，年轻人的热情似乎能融化一切，何国琦也不例外。大学4年，他利用一切时间沉浸在学习中，沉浸在学好知识报效祖国的理想里。

1955年，何国琦参加了毕业前的生产实习。同行的38位同学被分配到柴达木盆地北部的大、小柴旦地区进行地质填图，编入大队部设在格尔木的632石油普查大队。

何国琦带领的这38人组成的中队被分配在格尔木以北约250公里处，这个填图区是一个连地形图都没有的山前戈壁地带，荒无人烟。为了提高填图效率，这38人被分成3个小队，分别在各个地区自行勘探测绘。

当填图工作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往来3个分队的接图任务就落到了时任中队长的何国琦肩上。

分队之间的距离一般为几十公里，他有时徒步行进，有时骑一匹骆驼。因为没有什么通讯手段，分队之间全靠担任驼员的藏族同胞带信，以掌握经常搬

家的各分队的位置，由于和藏族驼员之间的语言交流不那么通畅，各分队间的通讯经常出问题。

让何国琦刻骨铭心的野外走失经历正是因为驼员传错了话，把要去的分队搬家的方向说反了。

沿着驼员所说的方向走了一天之后，仍不见分队驻地的影子。何国琦察觉到了问题，决定离开原来走的路，沿着一条有新鲜驼粪的路走下去，他想这样总能走到一个有人的地方。

夕阳西垂，夜幕降临。考虑到戈壁荒郊，状况百出，早已疲惫不堪的何国琦也不敢坐下来休息。为了保持清醒，何国琦开始绕着一个原点转小圈，就这样熬到东方泛出一抹光亮，何国琦又向前迈出了步子。

没有食物没有水，又伴随着体力的透支，何国琦渐渐感觉事情不妙。已经极度疲劳的何国琦此时大脑已经一片空白，机械地向前迈着步子。路边累累白骨映入眼帘，何国琦依稀辨认出大概是些人和马的遗骨，还有散乱的毡片和马镫。显然，这是不知在多久以前，未能走出沙漠的人马所留下的。何国琦环顾四周，一望无际的沙漠让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无助，焦虑和恐惧排山倒海而来。

当时的何国琦意气风发，正是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年龄。“我不能就这样倒下”，何国琦默念着“坚持就是胜利”，鼓起精神往前走。到了这天的傍晚，他用尽最后的气力爬上了一个高出地面几米的沙丘，躺了下来。“希望有人能发现并来施救吧”，何国琦这样想。迷迷糊糊之间，也不知过了多久，他隐约听到远处有人一边叫喊着、一边冲他跑来。

原来，当时他离另一个分队已经不远了，一位青海省的民工发现荒地里躺着一个人，就向远处的帐篷呼喊，闻讯跑过来的同学将他送回分队帐篷中。

时隔60年，何国琦早已记不清那位民工的名字，但是一群人向他跑来的画面却时常萦绕在脑海中。“我忘不了他们，救命之恩哪！”

第二天，已经恢复体力的何国琦启程返回自己所在的分队。由于位置清楚了，只半天多的时间就顺利到达了。同学们从老远跑过来把他团团围住。有一位同学一把抱住他哭了起来：“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在此之前，当同学们得知何国琦没有按时到达预定要去的分队后，便认为他走丢了，立即报告了大队。大队的领导也从远在格尔木的队部赶来指挥救援，甚至已经讨论从新疆调

飞机、夜晚点燃篝火的救援方案。跋涉而来的大队队长见到何国琦长舒了一口气，从此大队有了一个死规定——绝不允许任何人单独行动。

那种迷失在沙漠中的孤独、无助和重新回到集体中的温暖、幸福，时常交织在何国琦心中。这两种感受相互碰撞、杂糅，让何国琦明白了集体的重要性，明白了“坚韧不拔”精神的可贵。

何国琦说，他一直到将近80岁的时候仍然能够长期在我国北方边陲及其各中亚邻国的艰苦条件下坚持野外工作，并保持心情愉快、兴趣盎然，与这次实习中得到的锻炼关系极大。“一个没有走过远路的人，听到要让他走15里路，会惊讶‘哎呀，那么远’，可是当他有了一天走180里路的经历后，他就会觉得这根本没什么。”

留学苏联，几经周折终归国

1956年毕业后，教育部通过考试从何国琦这一届全国的毕业生中选拔了地质类的学生约30人准备送往前苏联留学，何国琦凭借优异成绩入选。学了一年俄语，又在地质学院做了两年助教后，何国琦于1959年来到莫斯科大学继续深造。留苏期间，何国琦师从著名区域地质和大地构造学家A. A. 博格丹诺夫。

留学期间，何国琦在哈萨克斯坦地区进行地质填图和区域大地构造研究。他曾随莫斯科大学哈萨克斯坦基地的考察队进行长时间的野外实地调研。当时的司机萨沙跟何国琦熟识之后，便跟他开玩笑说：“你们中国来的学生，好歹做点什么，到时候论文都能通过。”这看似玩笑的一句话激发了何国琦为国争气的信念，他决心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人也是能认真做事，也是能做出成果的。

那一代的留学生大都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有着强烈的不甘人后和为国争光的信念，凡事都会首先想到自己的国家。为了证明自己能做得更好，何国琦严于律己。在实习期间，其他人跑野外都是坐车，大概每 500 米停一下，而何国琦都是靠两条腿一步一步丈量这块广袤的区域。天道酬勤，何国琦解决了这个地区多年来难以寻找到化石来确定地层年代的难题。在收队时，司机萨沙指着何国琦向队里其他人说：“他一个人走的路，比你们全队人走的还要多，所以他才能有这样的发现。”



何国琦（右）和司机萨沙合影

何国琦在留苏期间参与了哈萨克斯坦两幅 1:20 万比例地质填图，负责地层专题，完成了哈萨克斯坦北部奥陶纪地层和笔石动物群的学位论文，在化石稀少的中、晚奥陶世复里石组合中，发现了大量笔石化石，所建立的中、晚奥陶世笔石分带方案沿用至今。

在研究生学习的后期，导师认为何国琦所收集的地质古生物资料十分宝贵，希望他能多留一段时间，待进一步完善研究工作后，直接拿一个博士学位。但是此时，中国大使馆想让何国琦留下来工作。当时“无条件服从组织”是他们这代人的信念，何国琦便婉言谢绝了导师的好意——尽管做一名外交人员并非何国琦所愿。

到使馆工作后，萦绕在何国琦头脑中的问题是如何尽早回国，实现他开展国内外地质对比研究的目标。此外，他

对家人的思念也越来越强烈，毕竟离开父母和妻儿已经近 4 年了。尽管做一个职业外交官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业，但何国琦太爱地质专业了，而且这时在专业上已比较成熟，并已有了较明确的科学目标。何国琦多次向领导表达自己回国从事专业工作的强烈愿望，终于得到许可，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当火车进关到达了满洲里火车站，办理了相关手续后，何国琦从热情的接待人员手中接过了两元人民币（按规定，这是给留学归国人员的旅途补助）。此刻的他紧紧握着那两块钱，有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他听着久违的乐曲，在站台上漫步。那种重新踏上祖国土地的难以形容的激动，让何国琦每每回忆起来都唏嘘不已。

卅年磨剑，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学术界原来认为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地质构造的形成以晚古生代造山作用为主，实际上，早古生代造山作用也很重要。或者从硅铝质大陆型地壳形成的阶段来说，中国北方大陆型地壳的相当部分，在早古生代已形成了，而晚古生代及其以后的地质作用只不过是对于它的叠加和改造。何国琦为了证明这一点，花了将近 30 年。

早古生代是北方大陆地壳形成的重要时期，伴随早古生代阶段地壳的生长，势必会有大量矿产的形成，这在邻区已得到证实。在我国，该阶段的成矿作用尚待加强研究。另一方面，我国北方沉积盆地的部分基底被证实是早古生代的，那么，在这里晚古生代的层系就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褶皱基底了，而它的过渡性质恰好具有了生成油气系统的条件，这在邻国也是得到了证实的。换言之，在现在我国北方的一些油田之下，可能还存在着更有前景的勘探新领域。这是何国琦当时的认识。

何国琦的这种认识其实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已经有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认识并不被多数同行所重视。他的老师和好友们对他的支持，很多也只是出于看到何国琦在认真做事，并非对这种认识的认可。对此他并不急于争论，而是在野外考察和资料研究中一点一滴地积累事实。



何国琦（左）在野外考察

30年间，何国琦的脚步从内蒙和甘肃的北山地区开始，然后到新疆，其间还穿插着多次到邻国的考察。对每一个地区，他都是一条沟一条沟地做地质观察，并在观察的基础上认识基本的地层和构造框架，然后再进行综合分析。

随着近年北方地区高精度年代学研究的开展，越来越多的早古生代的年龄信息在各类地质体中被发现了。何国琦自己也在2005—2006年西准噶尔地区的研究工作中，在原认定属于晚古生代的造山带中不幸找到了证明它是早古生代造山带的确切依据，从而给他长期的研究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007年11月，何国琦随中国代表团访俄，参加在俄罗斯中国年框架中举办的俄中地质与资源交流活动。11月19日，何国琦用俄语介绍了我国西北地区地质矿产研究的进展和对中俄地质对比研究的意见，他从报告厅讲台走下来的时候，下面有人高喊“Герой! Герой!（英雄! 英雄!）”



何国琦研讨会上发言

何国琦说，他真正的学术生涯从留苏期间在哈萨克斯坦早古生代地层中发现笔石化石开始。这么多年，他在中亚和中国北方转了一大圈，又到了离哈萨克斯坦最近的西准噶尔，并以他从青年时代以来所积累的经验识别出了含化石的早古生代地层，完成了对中国北方和中亚邻国大陆型地壳形成时代的论证，说起来也是挺凑巧的事。

“看起来，人一生能够工作的几十年真的是非常短暂，一晃而过，前后所做的事能相互关联才好。当然，由于地质学研究的对象庞大、历史漫长，而地质历史留下来的记录又残缺不全，任何新的认识都只有相对意义，需要许多代人的努力，才能一步步揭开属于地球的奥秘。”

“对一个相当大的复杂的地学区域，有我们的发言权”，这是何国琦和

他的学术同行们所追求的。每一代要利用大自然，就要去研究它的规律。

源头活水，北大人日用的地热井

地热是可利用的清洁能源，也是重要的地球物理场之一，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地球的形成和演化历史。上个世纪 60 至 70 年代，北大成立了专门的地热组，何国琦也是地热组成员之一。1969 年北大地热组曾提出在北大打一口深度在 3000 米的井，预期获得约 70 摄氏度的热水的建议，但由于资金问题而搁浅。

2000 年之后，中低温地热水的开采、利用价值在城市建设中日益显现。在北大打一口热水井的事情又重新被学校的行政领导部门提出来。当时进行了相当激烈的论证会，有支持者，亦有反对者。

何国琦个人当时是坚定主张打井的。几经周折之后，2004 春，钻井施工在北大静园开始了，何国琦被聘为技术顾问。

2004 年在静园打第一口井的时候，何国琦也忐忑异常，一直在井台盯着。静园地热井打到 2000 多米的时候温度还比较低，直到打到了页岩层后，何国琦才稍微放心了一点，说可以继续打，只要打通了页岩层温度应该就可以上

来。事实果然没有让何国琦失望，静园的第一口地热井工程很成功。

该热水井获得了符合设计要求的水温、水量和水质，并在以后几年的利用中达到了预想的效果，经济价值也是可观的。它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为北京市在西北城区开发地热水探了路，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当时四五百万的成本仅用了两三年就收回了。

2006 年，在北大会议中心的建设过程中，第二口热水井也开始施工。何国琦再次受聘为顾问，这口井的建设同样获得了成功。第一口井主要供勺园和周边宿舍使用，第二口井主要供中关村。

虽然何国琦认为静园和国关学院处的两口地热井只是自己的业余成果，但其实现在北大师生的淋浴用水都依赖这两口地热井。校区两口地热井的成功，无异于把京北的小汤山搬到了北大。此外，两口井构成了“对井”，大大提高了地热水利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何国琦认为，无论如何，事隔 30 多年之后，北大地热组当初的愿望得以实现，并能为北大的建设和丰富校园文化作贡献，这是很令人欣慰的。

从大学选择地质开始，各样的人生际遇，一路艰辛坎坷，所有这些都不曾改变何国琦对地质的挚爱初心。“年轻

时树立的目标自己都尽可能去实现，不管多高的山、多大的沙漠，差不多能走的路我都走过。”何国琦曾笑言自己学走路学得特别晚，但是何国琦一直在路上，一路前行。（本文参考了何国琦

老师相关的其他采访报道）（文/赵凤芝
刘华东）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学者谈读书

王蒙：创造性的读书

我说的这种读书方法，是一种创造性的读书方法。读书的目的不仅仅是接受已有的知识，而且是要通过自己的个性与经验，通过自己实际的阅历，来跟书本上的内容相对应，再从书本中获得新的启发，或者是发现书本上的“漏洞”，给予其补充。如《红楼梦》中说，这本书最重视的是“事体”和“情理”。前者即指每一个事件，包括这个事情的大小所占据的分量，以及它的作用。其意思就是：对一些事件本体本身的来龙去脉要弄清楚。后者即是否符合参与这件事情的这群人的感情、心情和道理，也就是：是否符合逻辑。

读书的过程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而且每读一次都会有所创造。如果完全没有任何创造，只是一味地就书论书，就事论事，我们就会少得到许多读书的乐趣和智慧。以上就是我要总结的第一点，即我们读书必须是创造性地阅读，应该要求自己能创造性地阅读，创造性地工作，创造性地生活。创造的很主要的一条就是把自己的身心、个性、经验放入其中。

第二点，我也提倡审美性地阅读。尽管有一些命题和公式还未完全弄清楚，但是，我们会感觉到：前人已发现了多少美好的观念，多少美好的命题啊！我很喜欢音乐，但对高深的音乐并不懂。看到五线谱的时候，我还得用手指头去数再翻译出那个音符。可是我曾听音乐家们说过：有些派别的作曲家的曲谱特别漂亮，你不用考虑如何照着它演奏，只要看着曲谱就行，那种一泻千里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当抱着一种审美的快乐的心态去阅读的时候，你就会从书中获得许多的发现。

第三点，中国有一个成语：“融会贯通”。其意思就是：用生活的态度来读书。所谓“生活的态度”就是：读这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知道书，更是为了获取生活的智慧。我们还可以具体地说“生活”：第一，要“生”，即我们要从书中得到新鲜的感觉。如果一本书中没有新鲜感，就可以不去阅读它。第二，要“活”，即真正把书中的命题消化吸收，进入自己的细胞里面，从而成为生活中的一种力量和启发。每个人

读书的情况，各有不同。我谈的这些，或许就适合我这种情况。对一个正准备考取博士学位的人来说，我提的这些建议很可能就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又如，对一个正在备课的老师而言，无论新鲜与否都必须看，否则在课堂上就要糟糕了。再如，对一个翻译来讲，

他也必须阅读已有的那些材料，遵守翻译的那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即使存在着某些不同意见，也容不得商榷，必须照着翻译。

作者：王蒙

来源：中国好书

黄永玉：书和回忆

我从小不是个喜欢读书的孩子。幸好当时的先生颇为开通，硬灌了一些四书五经和其它文学历史基础之外，还经常带我们到郊外检验自然界和书本记载间的距离，提高了兴趣。

一上中学就碰到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在颠沛的生活中一直靠书本支持信念。

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给了我不少启发，“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他的意义我那时即使年轻也还是懂得的。他的修养本身就证明不会教人完全不理会中国书本。他曾经说过，“少读中国书不过不能为文而已。”何况中国书中除了为文的用处之外，还有影响人做坏事、落后的方面与教人通情达理做好事、培养智慧的方面。我还是读了不少翻译家们介绍过来的外国书。

和一个人要搞一点体育活动一样，打打球，游游泳，跳跳舞，能使人的行为有节奏的美感，读书能使人的思想有节奏感，有灵活性。不那么干巴巴，使尽了力气还拐不过弯来。读一点书，思考一点什么问题时不那么费力，而且还觉得妙趣横生。

我很佩服一些天分很高的读书人。二十年前的一个礼拜天，我到朋友家去做客，一进门，两口子各端一本书正在埋头精读，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也各端一本书在埋头精读。屋子里空荡荡，既无书架，也无字画；白粉墙连着白粉墙。书，是图书馆借来的，看完就还，还了再借。不记笔记，完全储存脑中。真令人惊奇，他们两口子写这么多的书完全是这种简朴方式习惯的成果。

一次和他俩夫妇在一家饭馆吃饭，他知道我爱打猎，便用菜单背面开了几十本提到打猎的旧书目，标明卷数和大约页数。

我不行，记性和他们差得太远；尤其是枯燥的书籍，赌咒、发誓、下决心，什么都用过，结局总跟唐·吉诃德开始读那篇难懂的文章一样，纠缠而纷扰，如堕五里雾中。

我知道这方面没出息，因此读书的风格自然不高。

我喜欢读杂书，遇到没听过、没见过的东西便特别高兴，也不怎么特别专心把它记下来，只是知道它在哪本书里就行。等到有朝一日真正用得着的时候，再取出来精读或派点用场。

我有许多值得骄傲的朋友，当人们夸奖他们的时候，我也沾了点愉快的光。

遇在一起，大部分时间谈近来读到的好文章和书，或就这个角度诙谐地论起人来。听别人说某个朋友小气，书也不肯借人等等；在我几十年的亲近，却反而觉得这朋友特别大方，肯借书给我。大概是我借人的书终究会还，而他觉得这朋友要人还书就是小气了罢！

还有个喜欢书、酒和聊天的朋友，他曾告诉我一个梦，说在梦中有人逼他还书，走投无路时他只好说：

“……那么，这样罢！我下次梦里一定还你。”

多少年来，我一直欣赏张岱在他失传了的《夜航船集》中幸存下来的序里的一段故事。说一艘夜航船载着一些乡人，其中有位年轻秀才，自以为有学问所以多占了一点地盘。一个老和尚从岸上挤了进来，只好跟那些胆怯的乡人缩在一道。老和尚问年轻秀才：

“请教，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不看是四个字吗？当然是两个人！”年轻秀才回答。

“那么，”老和尚又问：“孔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不见是两个字么？怎么会是两个人？当然是一个人！”秀才回答。

这时老和尚自言自语地说：

“哎哟！这下子我可以松松腿了！”他把蜷缩的双脚大胆地伸开到年轻秀才那边去了。

这是个很好的教训。从年轻时代起，我就害怕有一对老和尚的脚伸到我这边来。我总是处处小心。如今我也老了，却总是提不起胆量去请教坐在对面的年轻秀才有关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学术问题。

在鲁迅先生杂文集里，我很欣赏鲁迅先生与当时是青年作家的施蛰存先生之间的一场小小论战。大概是有关于“青年必读书”提到的庄子与文选的问题而引起的吧！

鲁迅先生就是在那篇杂文中说起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的论点的。

施蛰存先生说，既然某某杂志征求的是如何做文章的问题，鲁迅先生说“少读中国书不过不能为文而已”，“可见，要为文终究还是要读中国书”。（大意）

我很佩服施蛰存先生当年敢碰碰文坛巨星的胆略和他明晰的逻辑性。

又是年轻的施蛰存先生，他抓住了鲁迅先生引用《颜氏家训》中叫儿子学

外文好去服侍公卿的话是颜之推自己的意思时，鲁迅先生承认手边没现成的书而引用错了。

我也很佩服鲁迅先生治学的求实态度。因为他强大，所以放射着诚实的光芒。

编辑：丁香耳朵

来源：中国好书

好文共赏

陈平原：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

我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学是在1991年。当时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那里从事了三个月的研究。因为那时的香港还没有回归，所以我们各有各的自尊，也各有各的骄傲。此后，我与香港中文大学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在1997香港回归前后，我看见他们的挣扎，也了解他们的努力。从2008年开始，我成了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双聘教授，合作更多，观察自然也就更为细致。两相比照，我发现：香港的大学越来越自信，内地的大学却越来越不自信。

自信与不自信，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大学办得好还是不好，而是意味着内地的大学现在换了一个跑道，即所谓“参与国际竞争”。此前，内地与香港的高等教育，可以说是各走各的路，各有各的骄傲。在内地，我们很容易判断哪些大学办得好，好在什么地方。但今天，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游戏场。对于内地大学而言，这套游戏规则是全新的，显得不太适应。

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1998年——我相信日后教育史家会记得这个年份。那一年发生两件事情，对于此后内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一是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我们今天都熟悉的名词——985大学。一开始国家确定重点支持北大、清华，后来扩展到复旦、南大、浙大、中国科技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工大。虽然日后列入985工程的大学扩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还是2+7。此前，教育部已经发布过211计划，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所有这些——“2+7”、“985”、“211”，对内地大学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二是经历1998年的经济危机，作为对策之一，中国政府决定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从次年起大规模扩招。所以，近15年的内地高等教育，基

本是在两条很不一样的道路上奔跑，一是追赶世界一流，一是拼命扩招。

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得到了国家及民间很多的支持，是这一系列工程的受益者。但与此同时，让我感觉不安的是，那些被排斥在 985、211 之外的大学的处境却越来越艰难。现在内地的高等教育，就像金字塔一样，备受瞩目的是处在顶端的大学，而很少有人认真讨论那些处于中间或者底层的大学。这些年，我有意识地走访了很多非 211 大学，包括开封的河南大学、太原的山西大学、保定的河北大学、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福州的福建师范大学，等等。在我看来，这些也都是好大学，有的甚至已经有 110 年的历史。但遗憾的是，在现行的制度设计中，这些非理工科的或者不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与师范类大学，一下子就被打垮了。校长很难找到较为充裕的经费，学校的发展通常遇到瓶颈。所以，我特别感叹，办一所好大学很不容易，但整垮一所好大学却不是很难。20 年来，非 211 大学与 211 大学的差距越来越大。当我们观赏北大、清华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考虑这些非 211 大学的艰难。

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沿袭的正是

“举国办奥运”的思路。换句话说，既然暂时没办法让全民都热爱体育且身体健康，那就先把一小部分人集中起来加强训练，目标是奥运会金牌。但不能忽视的是，就像中国足球一样，底层的水平上不来，顶端肯定也会出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教育规划，单靠几所名牌大学，内地的高等教育恐怕是无能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的。

除去制度设计的问题，大学排名也是影响当下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你见到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或书记，几乎都会跟你说他们学校的排名问题。即便不是全球排名，至少也是全国排名。我经常特别惊讶地听到一些数字，后来逐渐明白，每所大学都是选择某一年某一排行榜甚至某一单项中自己的最佳位置进行宣传。校长书记们也许并不真的这么想，但现实的压力使得他们只能这么说。记得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教授曾宣布港中文不参与排名后，马上就在排行榜中跌了下来。校友们纷纷关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母校排名为什么跌得这么快？校长没办法，只好重新回到这套游戏规则中来。这就是上文说的，我们开始在转轨，都在努力适应一套新的游戏规则；相对而言，

香港的大学基本适应，内地的大学却身心俱疲。


十几年前，我说过一句话，此后被广为征引。那是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一文中，我提出：“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但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却正是走在这么一条无关“本土情怀”的“标准化”的道路上。

改革太急与期待太高的中国大学

单就国际排名而言，香港的大学无疑比内地更占优势，因为他们的整个高等教育制度都是拷贝欧美大学，大多数教授也都在欧美大学接受教育。而今天中国大学响彻云霄的“国际化”口号，说白了就是以欧美大学为标准。所以，香港各大学的国际排名比内地高，并不

意味着其实际水平如此美妙。内地的大学现在都面临着转换跑道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与国际接轨”。我常追问：究竟是哪个“轨”？又应当如何“接”？国外的好大学并非都是同一模式，每个在海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理想大学”的范型。有人认为是德国的，有人认为是英国的，有人认为是日本的，更多的人认为是美国的——而美国东部的大学与西部的大学风格不太一样、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发展道路也迥异。在我看来，“接轨说”误尽苍生。今天的中国大学都想接轨，但又都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是接得不顺。为什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的包袱太沉重；二是我们走的本来就不是这条轨。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转轨，转得太急了，弄不好是会翻车的。

如此立说，并非否定中国大学必须改革，而是希望官员及公众对于“转轨”的期望不要太高，并不是“一转就灵”的。其实，所有的大学都在转变。比如，今天的欧美大学与二战以前已经有很大不同，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大学自己在“摸着石头过河”。而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是在政府的号令下连续急转弯的。无论是当初的大学升级，还是日后的大学合



并、大学扩招，以及近期的改普通教育为职业教育，几乎都是政府一声令下，各大学秣兵厉马、气势恢宏、步调一致地开始转轨。完全由政府决定大学应当往哪个方向转，且有明确的时间表，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言，其实不太有利。

从1998年到现在，中国大学改革的步伐不可谓不大。可办教育的人必须明白，教育是一项长期工程，急不得。当你把手中的石头丢进大海，等到涟漪荡向岸边，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如果你追求“掷地有声”，那只能是在面积很小的水塘，或者一口枯井。古人明白这一点，所以才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说法。整天强调“世界一流”，不是理想的状态。在我看来，办教育应当拒绝急转弯，拒绝大跃进，不急不慢，不卑不亢，走自己认准的路。这样坚持5年、10年、20年，中国大学才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康庄大道”。

到过国外大学的人都知道，校园里很安静。可是回到中国内地，几乎所有大学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校长不断地在制定发展计划，系主任也是踌躇满志，甚至每位教授都热血沸腾。这样的画面令人感动，但我必须说，这样的状态也让人担忧。大学改革，应当稍安勿躁。从15年前的大学扩招到今年的要

求600所大学转为职业教育，一路走来基本上都是对于先前政策的调整与否定。这样不断的急转弯，非常伤人。办教育的人要懂得，一个错误的决定，必须用十个很好的主意才能弥补过来。学生不应当成为小白鼠，大学也不应当成为小白鼠。一个重要政策出台，一代学生的命运也就与之直接相关。所以，教育的实验必须小心翼翼，特别忌惮连续急转弯。宁肯胆子小一点，步子慢一点，追求的效果是“移步换形”，而不应该是“日新月异”。

中国大学之所以步履匆匆，源于国人的期望太高。今天讨论教育问题的人，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向外看”，喜欢谈哈佛如何、耶鲁怎样；一是“向后看”，极力表彰民国大学如何优异。这两种思路，各有其道理。作为“借镜”，两者都是很不错的资源。但需要警惕的是，没必要借此对当下中国大学“拍砖”。我在演讲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热心听众提问，开口就是“中国没有大学”。我明白他的立场，但这样的表达是有问题的。中国不仅有大学，还有很不错的大学。中国大学“在路上”，请多一点点掌声，少一点点砖头。

现在有一种流行观点，说民国大学多好多好。可是持论者必须明白，今天

的中国大学同样需要一种“了解之同情”。民国大学是一种精英教育，这与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模式很不一样。整个民国年间的社会动荡姑且不论，即便是在局势相对稳定的1930至1937年间，在校大学生也就四万多人。等到抗战胜利，这一数字有所增加，也不过八万多人。而今天则是每年大约2600万人在大学念书，二者很难同日而语。再如，当我们追怀民国大学的独立精神时，既要看到校长与教授争取自由的努力，同时也得承认这与民国年间教育部的管理不细、经费有限直接相关。所以，当下中国大学的困境必须直面，不是召唤“民国大学”的亡灵就能解决的。

大学史的研究也好，大学评论也罢，都应当是一种有情怀的学问，追求的是启示，而非影射。大家应当明白，中国大学不可能迅速地“世界一流”，所以还请大家多一点耐心。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目前这样全民都在关心大学问题。过于受关注，以至于没有办法从容地坐下来，喘一口气、喝一口水，这对大学发展是很不利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蔡元培在把被捕的北大学生营救出来后，留下一句“杀君马者道旁儿”，就离开了北京。这是借用汉代应劭《风

俗通》的话，意思是说，对于骑快马的人而言，道旁观众越是喝彩，你就越快马加鞭；马被催得越跑越快，最后就气绝身亡了。对待中国大学，同样是这个道理，今天被追问为什么还不“世界一流”，明天又希望你多得诺贝尔奖，很可能导致中国高等教育步伐不稳，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在《大学何为》的序言中，我曾谈到：“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为我更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大学改革，别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历史证明，那样做，不只不现实，而且效果不好。”这本《大学小言》，同样如此。希望我所描述的香港的大学可以成为我们讨论内地大学问题的一面镜子，但不是“砖头”；让我们理解我们走过来的道路，以及我们能够达成的目标。

作者：陈平原

来源：爱思想网

编辑：丁香的耳朵

■ 史苑钩沉

史焕章：情系未名湖

摘要

五年大学生活，精彩纷呈，令人神往。当年的莘莘学子，已先后步入古稀之年。回顾 50 年的风雨历程，个人的成长发展，几乎都可以从母校师长的教诲、校园氛围的熏陶、北大精神的激励中找到源头、找到影响。

1 进京路上

我是一个调干生，高中只念过一学期，能以同等学历考入北大，圆了我的大学梦，这是我一辈子的造化。从上海去北京，坐的是学生优惠车，一张火车票只要十元钱（普快硬座半价）。可是火车跑的特别慢。因为它是加班车，遇到正常经过的客货车，一律谦虚地靠边站，几乎遇站必停。如南京、济南大站，要停几个小时。只要车停下，我们就下去逛。什么济南、徐州、蚌埠都下去过。心情特别好，什么都感到新鲜。可到后来实在是太累了、太困了，只要有空隙的地方就躺下来睡，甚至还爬到行李架

上去睡过（因车厢十分拥挤，列车员也进不来，未被发现）。结果我们那次车路上跑了整整五十个小时。

车到北京，停靠在了前门车站。一下车只听见一片叫卖冰棍声。北京冰棍特长，横过来像吹口琴似吃的。上海冰棍短而粗，吃法不同，感到新鲜。乘坐接新生的校车去学校，一路上见到北京的旧街道几乎都是平房，市区出了天安门城楼外，最高的建筑要算北京饭店了。不像现在首都高楼林立，旧北京的痕迹越来越少了。

当时上海到北京特快也要 20 多小时，后来有过几次提速。第一次是造了南京长江大桥，火车不用坐渡船过江了，一下子缩短了两个多小时。在改革开放年代又有过两次提速。目前动车组到北京只要九个多小时。到 2012 年京沪高速铁路修通后，上海到北京 1318 公里只要五个小时，你说变化有多大。

2 可敬可爱的老校长马寅初

1956年进校，当时北大的师生也有上万人，一个普通学生想见一校之长，谈何容易。入校第二年，机会来了。那是1957年春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伏老到北大访问。在那一次活动中，老校长也出来迎接。我们有幸第一次零距离见到了心目中敬仰的马寅初校长。当时在东校门的马路上，同学们围着老校长问这问那，主要是关心他老人家的健康。马老说他已76岁了，但每天还坚持洗冷水澡，还能做俯卧撑，边说边做起来了。同学们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老校长身体这么棒，担心的是怕出意外，都劝他不要做了。这次遇见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也大大激发了我日后参加体育锻炼的自觉性。

第二次见到老校长，是在1957年4月27日，在大饭厅听他做人口问题的演讲。马老一上来就说，我姓马，这个马不是马尔萨斯的马，而是马克思的马。接着他讲述了这几年对人口问题调查研究的结果，他认为解放后，各方面条件都好起来了，如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婴儿、孕妇死亡率下降，和尚尼姑大部分还俗，妓女得到了拯救……等等。因此，人口增长也加快了，近几年已达千分之三。因此，他提出要控制人口，把出生

率降下来。无数事实证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但在当时政治背景下，马老受到了不公正批判。马老冷静面对批判浪潮，对自己的理论认真梳理后认为并无过错，对批判文章主要观点一一进行反驳，并公开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这就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这就是我们的老校长。这种事实求是的科学态度，为捍卫真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给年轻学生的震撼是巨大的，它将长期留在同学们的脑海里，并已成为北大精神的组成部分，将由年轻学子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3 参加国庆游行

五四大学生生活中，有幸两次参加首都的国庆游行。游行对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记得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参加第一次国庆游行，当时年轻人对参加这类活动热情很高，经常不分白天黑夜参加狂欢，第一次国庆游行由于组织者缺乏经验，游行时间拖的很长，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往往头天半夜就起床出发，第二天游行后回来已是下午天快黑了。

刚入学不久就通知我们参加当年的国庆游行。我是参加腰鼓队（在上海参加过，会一些简单的动作）。国庆当天我们先到清华园，坐火车到西直门车站再换车，赶到目的地。通过天安门主席台时是很激动的，可惜我因眼睛近视，看不清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脸型。反正我知道都在城楼上。那天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小雨。游行结束后感到丝丝凉意，因为只穿一件白衬衣。我们几个同学就一起赶到新街口，在一家羊肉馆喝了一碗羊肉汤，当时感到这是天下最好喝的汤了。一碗汤下去身上也暖和了，再吃几个烧饼，肚子也不饿了。这碗汤在以后的岁月中也难以忘怀，好像在北京再也没有喝到过这么好喝的汤了。

第二次是 1959 年参加国庆十周年的游行。北大和清华的同学组成“首都民兵师”方队。我们是扛重机枪和步枪。为了步伐整齐，前几个月就抽时间到清华园去集队训练。一到星期六晚上，又赶到天安门前东西长安街上去排练。当然这些街道已临时封锁，专门留出时间来供参加游行的仪仗队、红旗队、民兵师等实地演练。结束回到学校已是深夜了，但大家适中保持了旺盛的斗志。

当天游行结束后，学校通知我们不返校，参加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焰

火晚会。各个学校的同学们，打着各自的校旗，围着一圈一圈唱歌跳舞。后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也到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与民同乐。广场生气氛达到了高潮，一遍遍呼喊口号，忘却了疲劳。

4 忆张国华老师

一提起北大的导师，我们会自豪地告诉人家，教过我们的有一大批从欧美各国以及苏联流血回来的著名的老专家，如王铁崖、龚祥瑞、芮沐、赵理海、沈宗灵、张宏生等等，还有一大批经过战火洗礼的老革命，如马振明、肖永清、范明、张国华等。

在这里我特别向大家介绍的是 1989 年初，由张国华老师带领的中美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中方代表团去美国迈阿密参加委员会会议的一次活动。中方代表团由北大、人大、中政大、吉大、武大、复旦、华政、西政等院校组成。由张国华教授带队，王晨光当助手。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个代表团。

在出发前，我还特地住在镜春园张国华老师的家里。在迈阿密委员会会议上，除了回顾这个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 CLEEC 几年来的成绩，还讨论了下一步的打算。当时一年一度的全美法学院院长会议和法学教授会议同时在迈阿密召

开，我们也参加了一些活动。还同时得到杨百翰大学法学院院长邀请，中方代表团会后专程访问了该校。当地的北大留学生知道张老师等要去，专程跑到杨百翰大学所在地犹他州的盐湖城来迎接我们。当晚还带我们去湘菜馆用餐。异域巧遇北大人，我们心里特别高兴。在杨百翰大学法学院举行的大会上，张老师专门介绍了中国法学教育情况，回答了大会提出的问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也扩大了北大的影响。代表团在纽约时，当地北大留学生热情邀请张老师和我们去他们那儿做客并去市警察局专门拜访了时任副局长的美籍华人莫虎先生。整个活动在张老师带领下获得圆满成功。

5 大饭厅

最后，谈谈大饭厅。

大饭厅地处校园中心，不仅是同学们用餐之处，同时还是听报告、看演出、放电影的场所。如老校长人口理论的报告以及侯宝林说相声、孙道临演讲、交响乐团演出等等。除了夏天一段时间在东操场放露天电影外，平时多在大饭厅放映。所以，这里是同学们活动频繁的场所。

入学时，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是十二元五角。早上有香肠、咸蛋、兰花豆等等、红薯上市时，交六分钱进去，管饱，够便宜的了。当时大饭厅又不像现在阔气，只有方桌，没有凳子，大家都是站着用餐。餐毕把碗筷洗净了放进小布袋里。多数同学随身带着去上课，甚至去海淀逛街也能看到带着碗袋的北大同学。记得有一次在一间阶梯教室上李世繁教授的《形式逻辑》课，即将下课时，有一个同学布碗袋发出了响声。这下李老师可生气了，认为这是对他的不敬，把这堂课延长了足足十分钟。饥肠辘辘的同学们只好干着急，心想到饭厅排队一定是排到很后很后的了。

在困难时期，学校发就餐卡，规定定粮不可超前食用，即今天不能吃明天的，但可吃昨天的积余。大学生每月32斤定粮，从全国来说算是高的了，但年轻人还是感到不够吃。有一次我把辛辛苦苦“积余”下来的一斤定粮买了五个窝窝头，一次就干掉了，好像也不显得特别饱。今天粮食够吃了，有的同学任意浪费粮食，实在是不应该。在北大百年庆典之际，大饭厅已改建为大讲堂了。但对我们来说，大饭厅的印象是磨灭不了的。

回忆是美好的，记忆是点滴的，感情是真摯的。毕竟过去了50年，有些情节记得不太准了，请同学们看后指正。

来源：北大校友网

作者：史焕章

■ 大美北大

小雪

小雪，泛指下得不大的雪。气象学上指24小时内降雪量小于或等于2.5毫米的雪。

小雪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个气，在每年11月22日或23日，表示开

始降雪，雪量小。“小雪”时值阳历11月下半月，农历十月下半月。“小雪”是反映天气现象的节令。



古籍《群芳谱》中说：“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这就是说，到“小雪”节由于天气寒冷，降水形式由雨变为雪，但此时由于“地寒未甚”故雪量还不大，所以称为小雪。

此时阳气上升，阴气下降，而致天地不通，阴阳不交，万物失去生机，天地闭塞而转入严冬。黄河以北地区会出现初雪，提醒人们该御寒保暖了。小雪表示降雪的起始时间和程度。

来源：北大新闻

编辑：江南

学员心声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习收获与感想

我叫戴子翔，2013年3月入读北京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三年来，利用业余时间，我认真刻苦地学习每一门课程，修满了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学分，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各门课程平均成绩达80.5分，毕业论文成绩达86分，通过了学位英语考试。在北大网院三年的学习过程中，收获良多。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拓宽了视野，而且重温了系统性学习的方式方法，许多知识学后立即用于工作，受益颇深。主要收获与感悟归纳如下：

一、迎接挑战，进一步锤炼奋进向上的思想情操

我于2010年专科毕业，在工作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的不足，遂毅然决然的决定重新开始学习生涯，用知识来提升自己的能力，用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

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才能进一步的实现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人生是不能安于现状的！

通过在北大远程教育的学习，也让我更进一步的了解自己，老子说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了解别人，还比较容易做到；世界上明白自己的人绝对不容易找到。了解自己的人，才算是明白人，那就开悟了，开悟也就是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本来面目。如果要想达到这个了解自己的程度，不断的学习提升是一条必经之路啊！

二、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

没有决定继续提升学习之前，我工作上总是浑浑噩噩，什么事

做的不太好，处理事情也是只能看到点而看不到面。我在海南海

空工作，没有决定学习之前，我和同事的人际关系，对领导任务的完成度，都存在着大量的问题，总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而我在北大网院学习的这段时间得到的提升完全的应

用的工作中和生活中，2014年我被公司评为先进个人，2015年成为公司内部培训师，不但自己得到提升，还可以把自己学习的课程经验理论分享出来，带动整个团队，做到真正的大爱。

三、巧用时间，妥善处理学习和工作的矛盾

在职学习，一定要处理好时间分配问题。不能因为学习影响工作，也要挤出时间保证学习能够顺利进行。为使工作学习两不误，我对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进行了重大调整。在网院学习的三年中，我几乎推掉了绝大部分的应酬，将娱乐活动降到最少，充分利用零散时间，紧缩掉一部分休息时间，早起晚睡，惯常的午休时间也全部用来听课件、看教材。这样一来，挤出了不少时间用于学习。不要小看零零碎碎的小块时间，累积起来让我受益非浅。比如：候机和飞行时的几个小时，就可以学习课本知识；出差时在宾馆里可以上网听课件、参加答疑、登陆课程论坛提问讨论；工作间隙或会议休息时，抓紧时间背诵几道闭卷考试题；至于夜晚大块的安静时间，特别适合思考与分析，大都被我

用来琢磨重难点课程、做作业、解析思考题和撰写论文。

付出总是有收获的，通过不断的努力和付出我获得了提升。

四、结识同道，为学习和工作增添助力

在网院学习的三年中，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师生，大家互帮互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工作中，师生们也彼此帮扶，互通信息，延展了各自的工作半径。同时，由于成为了北大网院的学生，还有幸加入了北大海南校友会，在校友会历次活动中进一步汲取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营养，在今后的日子里通过校友会继续与北大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年艰辛的学习生活，为工作填充了后劲和动力，三年难忘的学习经历，为人生增添了色彩和活力。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会继续秉持北大“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学风和光荣传统，努力工作，认真学习。北大精神对我的教导和指引我将毕生难忘，我会更大的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去传播这种精神和这种大爱。

作者：海南商职学习中心 戴子翔